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236
2014年第1期

第41卷第1期 (總第236期) 2014.7.7 每冊港幣30元



七一大遊行人數創十年新高，餘波激盪

港人普遍反對國務院的香港白皮書

立即無條件釋放法律界和異議人士！

中日民間應該聯手反對軍國主義

21世紀初的不斷革命和反革命

突尼斯：勝利雖苦澀，但真實不虛

遍地開花

大進

6月20日，兩名不過十三、十四歲少年，遭警方拘捕。原因是他們被發現攜帶利刀和噴火器，參加反東北開發示威活動。後來新聞報導，這兩名少年並沒有黨派或政治團體聯繫。據稱，只是其中一人曾表示，不喜歡梁振英政府。

姑勿論兩名少年的意圖是怎樣，事件是否反映了：個體、零散化的「抗爭」模式會否越來越多呢？

姑勿論兩名少年的意圖是怎樣，事件是否反映了：個體、零散化的「抗爭」模式會否越來越多呢？

到了議會政治出現，亦可算涇渭分明。經濟上的分野，讓你可以找到由勞工階層到商家富豪的代表；而以政治立場來劃分，親中親台都有代言人。對社會問題的反應和行動，很多時都是「順理成章」，會在預料之內。多個以民主、民生、基層利益爲號召的政團，便儼如代表了所有群眾。

但到了後回歸年代，社運面貌在改變中。

管治上的敗壞，令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傳統政黨老化，部分更漸漸有建制化的傾向，很多時落後於形勢。議會政治的長期失效，驅使群眾不滿情緒日漸高漲，特別是年青人。他們轉向尋求其他途徑，自行組織起來，「實實在在」地來回應問題。他們自行組合，或加入不同新團體來參與社運。雖然部分或許只是爲求渲洩不滿，但尋求另闢途徑的意願，是明顯的。

回顧近年較爲人知的社會事件，不少都已並非再由傳統政治或社運團體主導：灣仔喜帖街遷拆、保育皇后碼頭、反世貿運動、反高鐵、菜園村遷拆，DBC事件、反國教、港視發牌事件，以至反東北開發的抗爭，都是明顯的例子。而港人抗議艾未未受打壓，在街頭塗鴉，把支援口號投影到解放軍大樓，都來自個別人士的行動。而甚至針對自由行的所謂「反蝗行動」，亦反映這個情況。

以往的抗爭播下了公民社會的種子，加上客觀條件改變，催生了新的環境。互聯網普及、電訊業發達、社交媒體發展一日千里，造就了較小規模團體的動員能力。在虛擬世界要引起關注和維繫一班群眾，成本較以往低。隨時開設一個網上賬戶作號召，是簡單不過的事。團體大多有自己的網頁和Facebook等等發聲平台。只要它們關注的議題，是切合社會的怨憤，要動員群眾也並非困難。

政府要對付這些新興團體，有一定困難。它們有些無往績可尋，政府弄不清楚團體背景。它們可能只有鬆散的主事人，而且抗爭手法層出不窮，往往跳出了傳統請願抗議的固定模式。因此，特別在團體出現初期，政府不知如何把它們定位來應付，例如以粗口諧音爲名的民間團體，便堂而皇之到立法會陳述觀點。

這些新興團體所關注的個別議題，可能是屬於地區性事件，或只涉及某個社會範疇。但若遇到政府激烈打壓，明目張膽的欺凌，而事件又反映到政府的嚴重失誤時，事件便有機會上昇成一個「全港性」大議題。梁振英班子拙劣的表現，演變成一次又一次，把個別社運團體聯合起來的機會。

另一方面，因爲新興團體未必有一套宏觀政治論述，涵蓋社會各個領域，焦點只是針對特定社會問題，當問題得到舒緩或解決，運動便可能再難有所作爲，無以爲繼。而且各個團體目標不同，策略各異，有時更互相排斥，客觀上是未必易於凝聚力量。學民思潮能從一個議題，轉向繼續關注其他的議題，實屬可喜現象。

社會存在矛盾，就必然有抗爭。在百花齊放的同時，民間團體如何能令抗爭運動持續，在適當時刻互相支援，確是一個考驗。



■學聯昨批評警方的清場行動濫權，考慮興訟。

紀念六四25週年與平反六四

涓滴



悼念六四屠城25週年的燭光晚會，今年又在維園舉行。參與民眾坐滿了6個足球場、隣近的籃球場和旁邊的草地，大會宣布人數有逾18萬人，警方則宣布有9.95萬人，都是近幾年的新高。這顯示眾多港人雖經過四分之一世紀，仍然沒有忘記這個日子！

參加者中有許多是從內地專程來的，他們先後參觀了今年新開辦的六四紀念館，瀏覽了有關六四民運及當局血腥鎮壓的歷史資料和圖片，為他們上了非常珍貴的一課，會把在港所見所聞傳回內地。

場地上更坐著無數年青的參與者，他們有些人還站在枱上作主持，顯示出薪火相傳，後繼有人。晚會以播放「毋忘六四，戰鬥到底」的短片揭開序幕。直到9時半完滿散會。

一直以來，在紀念六四時，支聯會都號召要爭取「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港人也普遍贊同，認為這個爭取目標，是天經地義，義不容辭的。

例如，「2011年6月4日和8日李怡先生在《蘋果日報》社論是如此擲地有聲的：

『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不僅是出於正義感，不僅因為我們繼承孫中山以來的真正愛中國愛人民而不是愛政權的傳統；還因為香港命繫中國，是因為我們知道，若沒有六四就不會有香港今天的困局。六四燭光為中國、也為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而點燃。』 中央直接插手香港事務，香港人就不能不關心中國的發展與變化。」

但僅僅3年之後，在《蘋果日報》今年5月28日的社論中，「李先生指稱：『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瘋狂發展，對人民的高壓手段變本加厲，80%以上的既得利益階層把財產家屬轉移國外，顯示對大陸政治氣候不信任。這種情勢，顯示實現中國民主幾近絕望。寄望中國民主而帶來香港民主，也只不過是自欺欺人。此情此景，香港人的六四政治思維就應該是拋棄依附更高權力的心態，不去乞求民主而要立足本土去爭取民主。』」(轉引自林卓廷先生刊於6月4日《蘋果日報》的文章)

李先生現在認為，要求平反六四，就是「依附強權」、「乞求民主」、「寄望『恩賜民主』」，那他3年前一直都承認應該平反六四，他是否

也是如此依附、乞求和寄望呢？這顯然是前後矛盾的，也是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很難以理服眾。

至於要求平反六四，是否必要和應該呢？答案絕對是肯定的。當日學生要求民主、反對官倒的和平大遊行和天安門廣場靜坐以至絕食，這些都是有秩序的和平行動，但當權的鄧小平、李鵬却污衊為「動亂」，這是必須由中共正式予以平反，還他們以清白的。鄧、李們更對這樣和平而手無寸鐵的學生、工人、平民出動坦克鎮壓，開槍屠殺，以致死傷2千多3千人；這一血債必須中共公開承認而加以認錯和賠償的。因此，必須平反六四，不容否認、反對。

就在今年「六四」之後第8 日，中共官方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聲」的署名文章，批評日本反對將南京大屠殺申報世界記憶名錄，是「強盜邏輯」，但却惹來網民取笑中共是講自己。(引自6月13日的香港《都市日報》METRO)因此，中共可以在1989年六四屠城，人民却不能出聲要求平反六四，也是「強盜邏輯」！香港人民不能或多或少受到中共的「強盜邏輯」影響或跟着走。

有不少人，例如李怡先生，認為對中國實現民主「幾近絕望」，便不再去號召和努力在國內爭取民主。當然，統治者，尤其是一直專橫霸道的官僚統治層，更不會主動賜予人民以民主；但人民必須全力去爭取自己應得而被剝奪了的民主權利，1989年民主運動爆發便是顯例。結果雖然被殘酷鎮壓了，但這決不表示89民運是不應舉行的。

在香港，捍衛和爭取港人的民主權利，也是絕對應該和必需的。但這決不會與內地的爭取民主相衝突，反而是休戚相關，緊密相連的。如果內地仍無民主，則香港的既有民主權利也時刻有可能被壓制，被剝奪。因此，我們不能「獨善其身」，只顧本土，而不理內地的民主發展，把兩地的民主割裂開來。

最後，必須指責的是，愛港之聲的高達賢至今仍然無視歷史事實和大量文件、圖片檔案，堅持認為當日天安門沒有一位學生、工人或市民被槍殺，這是睜着雙眼說謊，但騙不到人的！

10/06/2014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1卷第1期　　（總第236期）

2014年7月7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七一大遊行人數創十年新高，餘波激盪

振言

2014年港人七一遊行的參加人數，主辦機構民陣估算是51萬人，警方指由維園出發高峰時是9.86萬人，港大民研是15.4至17.2萬人，三者都是2004年七一大遊行以後的新紀錄。出發前人們冒着酷熱晴天和傾盆大雨，擠滿了6個足球場和草地，維園入口繼續大量湧入，擠不入的從旁插隊，由下午3時半起行，至晚上11時最後到達，經歷了7個半小時，眾多市民之如此辛勞持久踴躍參加，主要是對國務院白皮書的憤慨，据《明報》在現場作的問卷調查顯示，72%遊行的主因，是不滿白皮書的內容，港人繼日前用手熱烈參加公投表態之後，再用腳來爭取港人高度自治和真普選的落實。今年遊行的主題是：捍衛港人自主 無懼中央威嚇 公民直接提名 廢除功能組別，這些都代表着廣大港人的普遍願望。

不少內地同胞參加遊行，其中有知名維權律師及現被拘禁人士的家屬；最近在台灣和澳門領導抗爭勝利的一些人士也專程來港參加，但主要的幾位領導人則被港當局拒絕入境。參加了的人士事後將帶着所見所聞回去，與其他人交流經驗和體會，將有助於以後的抗爭。

遊行完畢後，學聯、學民思潮和許多社會各界人士，超過1200人，實行佔領中環遮打道，為預演佔中的公民抗命掀開序幕。警方卻在凌晨3時開始清場，把不肯離開的人士逐一抬上車，共拘捕了511人，成為回歸後最大規模的集會拘捕行動。

學聯指責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程序又混亂；被拘留者控訴，有多人在拘留時間，6小時內無水無食物，猶如在受「酷刑」，又拖延讓他們會見律師，上廁所也要等半小時。

公民黨議員梁家傑說，有義務律師協助被捕者，首批5名律師抵警校等候兩小時才能與48人接觸；第2批9名律師一直被警方拒諸門外，等近5小時至中午才能逐批與被捕者見面。律師會副會長熊運信認為，被捕者與律師接觸的時間應「愈快愈好」，等如此長時間是「不合理」的。

這次預演佔領中環，顯示出是完全和平無暴力的，這預告以後要舉行的佔領中環，也將會如此和平而無暴力出現。但以後的佔中規模更大得多，警方清場也要數天之久才能完成。發起佔中人士會從此次事件汲取經驗。

在此需要指出：當局對和平集會採取拘捕甚至檢控行動，是侵犯了市民應該享有的集會和示威自由權利，是警權過大的又一次表現，應該受到指責。

2014年7月3日



港人普遍反對國務院的香港白皮書

軍行

國務院在香港回歸後17年，史無前例地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在「一國兩制」下，香港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憲法及基本法授權，故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表明五十年不變。中央人民政府只在港設立機構負責處理外交外務，和管理香港的防務；香港政府則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但現在的白皮書，卻把特區政府受《基本法》明文規定享有的行政管理權等，改變為中央擁有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除權力」。這樣，便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來享有權力削奪去了。

「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只過了十七年就大變了。這樣明目張膽的毀諾背信，肆意「否定」(前趙紫陽秘書鮑彤的評語)《中英聯合聲明》，把《基本法》規定的對港政策作了實質改變，充分顯示出中共官僚專制的一貫本色。

白皮書又作出新規定：各級法院及其他司法人員是「治港者」，愛國是「治港者」的基本政治要求，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及安全職責。法官在內的治港者，應準確和貫徹執行「基本法」責任。

這就是變相將內地的三權合作「搬來」香港，取代了香港原有的三權分立，包括獨立的司法權。對此，香港大律師公會迅即發表四頁聲明，逐點批駁，指出法官和司法人員不應視為治港者，否則，會向公眾發出錯誤訊息，以為香港法庭是政府機構一部份，並與政府互相配合。但在香港，法庭一向都是根據完美和源遠流長的法例和憲法原則解釋法律的，不存在法官需要就《基本法》「一錘定音式的最終解讀。」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是根據與訟者的論據及事，公開透明地對法律作出解釋的。

聲明還以大楷黑體粗字形式強調：「尊重法治遠超乎事事只求依法辦事或依法施政那麼簡單，還包括在權力行使時自我制約，好讓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得到適當的重視和彰顯。」

如果香港法官變成愛國愛港的「治港者」，則他們審判必須考慮「國意」(亦即黨意)而非法理，難以公正裁決，逐漸類似於內地的法官那樣，擁有原非本份的額外權力，從而會造成許多冤假錯案。

據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指出：所有司法獨立的國家及地區，包括香港在內，法官只會宣誓向法律效忠，不會向國家或當權者效忠。本港法官宣誓詞並無加入「愛國」這類詞彙。

對於國務院這份錯誤荒謬的白皮書，香港律師會會長林新強卻不理律師會未決定發聲明回應之前，便搶先擅自表態撐白皮書，同時讚頌「共產黨好偉大」。

但律師會內有許多會員不滿林新強這種表態，有240會員迅速聯署給他的公開信，要求他收回在電台的有關說話。這一連串的發展，特別是公開信的發表，很快便激發港人的回應，首先是香港律師們號召於6月27日黑衣上街遊行抗議；跟著是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舉行全港電子公投及票站投票支持真普選方案，首日的電子公投便有40萬票。截至6月23日晚11時，連同票站實體投票，共有723,141票。即使撇除一些小錯誤，在投票後覆核刪去重複的投票，但其人數之多，遠遠超出主張佔中者的預料。市民這樣的踴躍，直接原因是憤激於國務院白皮書

的高壓，部份是不滿於出動黑客攻擊破壞，再一次証驗了「有壓迫就有反抗，壓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的運動規律。應可預料，即將要舉行的七一大遊行，參與人數會創多年來的新高，也可証明公投人數非常眾多的可信性。這些發展，反證出白皮書和出動黑客攻擊公投網絡所起的激發客觀作用。

儘管統治者及其幫兇都聲言這些公投是不合法理、非法的，更出動其宣傳工具和工商業團體資本家極力詆毀、抹黑公投，但眾多市民參加公投，不是為了要得到當局的承認，和建制派及資本家的讚許，而是要表達自己的意願，爭取實現真普選。

國務院要收緊港人的自治權利，早在李克強總理今年3月向全國人大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已有透露：他一反過去工作報告的慣例，只說將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而不再跟著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兩句方針。因此，「引起香港熱議」，被傳媒追問。喬曉陽、王光亞及張曉明均強調，中央對港政策並無改變。「張曉明指『一國兩制』是一個總概念，已包含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總理在報告中未提及只是從精簡報告文字的角度出發，其中並無特別考慮，亦非中央對港政策有任何改變，港人毋須過度敏感或擔憂。」(引自2014年3月7日香港《文滙報》訊)

這樣的答覆顯然難以令人滿意的。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充滿黨八股的報告，如要精簡文字，也不應省卻這樣重要方針的八個字。只在3個多月之後，白皮書就公佈了，証明港人並非「過度敏感」，不要擔憂。

其實，對港人高度自治的收緊，遠在工作報告由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後，就應已開始起草政府工作報告並把它寫入了。高官們回答傳媒的追問，只是睜開眼說假話而已！

2014年6月24日

後記：

「佔領中環」發起為期10日的全民投票29日結束，港大民研29日公布有超過78.7萬人參與，不計實體投票的初步結果顯示，真普聯「三軌方案」以33.1萬票，佔投票人數42%跑出，力壓取得30.2萬票的學界方案；對於若政府方案不符國際標準，高達69.1萬、近88%投票者表明立法會應予反對。

這是香港主流民意的真誠表現，顯示出港人在共同創造歷史，熱望能爭取到2017年真普選特首。這也是對國務院白皮書不滿的回應，由於電子及手機投票方便省時，遠比到票站輪候投票人數為多，相信還有很多人不能使用電子等方法或到票站投票而仍然贊同這樣行動的。

但內地官方卻譴責這一公投是非法、無效的，並出動其宣傳工具和支持者（包括工商等團體）盡力詆毀抹黑公投，無所不用其極。

官媒北京《環球時報》搶先發表社評誇稱：「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沒13億人多」，儼然以「朕即國家」，社評作者就是13億人的代表自居，以13億人壓港，更彷彿13億人都已享有公投權似的。中聯辦、港澳辦、經濟部、人民日報海外版等發言人都發炮轟全民投票佔中。梁振英迅即反駁《環時》，指任何人都不應將港人與中國人民對立起來，他的話雖想給七一大遊行降溫，但卻是對的。

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建民更反擊說：有勇氣就鼓吹中國公投。而在湖南長沙閙市黃興南路步行街，6月下旬便有5名民眾在街頭拉橫額支持香港「公投」，橫額上書「香港要公投，湖南也要公投」、「不做13億幫兇，要助香港公投。」《明報6月30日報道》在內地，相信有同樣意見的人會很普遍，反證《時評》的錯誤！

2014年6月30日

回應《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轉載)
社會民主連線立場書

政改方案諮詢文件經已出爐，洋洋千言，只是解釋「提名委員會」如何合理，並以《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作為框架，準備提出「鳥籠民 主」方案。社民連堅決反對任何框架限制港人爭取真正的民主普選。就此，我們以立場書提出具體建議，供社會深入討論。然而，我們必須申明，政改方案關鍵在於 「無篩選」，任何方案都應以此基本原則為底線。目前，「公民提名」此基本提名權為「無篩選」的主軸，若然特區政府不接納「公民提名」，明顯無意落實真普選，我們則唯有公民抗命，佔領中環。

基本原則與立場

（一） 主張「全民制憲」，籌備制憲大會，透過「公民投票」，重新制定《基本法》，但鑑於目前形勢，香港群眾最大共識為「公民提名」。因此，首要任務是繼續以爭取「公民提名」集結最大民意，確立「真普選、無篩選」；

（二） 鑑於《基本法》並無人民授權，「人大決定」亦毫無認受性，我們絕不接受以此為政改依歸，亦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篩選或預選，包括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及「愛國愛港」等限制；

（三） 政改方案必須確保香港公民不受無理限制，有權利及機會享有普及而平等的提名權、投票權及參選權。若人大常委會透過釋法或作出決定，否定「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符合現時的《基本法》，特區政府有責任提出修改《基本法》；

（四） 我們將推動辭職公投，讓香港市民表決政改立場；

（五） 若果特區政府不順應民意，我們必定公民抗命爭取真普選。

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

（一） 公民提名，不可或缺；

（二） 公民提名：提名門檻不可多於全港選民1.5%，提名期不得少於2個月，提名交由選舉事務處核實後確認參選人資格；

（三） 除公民提名外，可有其他提名方法，包括政黨提名及議員提名；

（四） 政黨提名：最近一次立法會選舉，在分區直選中獲得5%或以上總得票的政黨或聯合名單，有權提名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

（五） 議員提名：現屆不論有否政黨背景，約4名立法會議員或約25名區議員聯名（5%），有權提名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

（六） 採用兩輪決選法。候選人經全民投票，超過50%者當選。若未有候選人得票超過50%，則在首輪投票選出得票最多的兩位進入次輪選舉，超過50%者為行政長官，若第二輪仍無人得票多於50%，則須在六個月內重新進行第二輪選舉，簡單多數者勝；

（七） 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不可限制行政長官候選人數目及任何背景，包括政黨背景及「愛國愛港」等。

二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

（一） 堅持2016普選立法會，全面取消功能組別；

（二） 以全港不分區比例代表制取代原來所有功能組別議席，並准以個人或名單參選，得票超過5%的個人或名單才獲分配議席；

（三） 現有分區直選比例代表制維持不變；

（四） 修改《基本法》，確保立法會有提案權、修法權及罷免權

甲、 提案權：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須受「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限制，且要得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才能提出，大大限制議員的提案權。由此，必須修改第七十四條，容許議員不受限制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呈交立法會表決；

乙、 修法權：立法會應有權力提出修改香港本地法例，不受限制，呈交立法會表決；

丙、 罷免權：立法會亦應有權力彈劾政府主要官員及行政長官，凡立法會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員通過彈劾官員議案，該官員必須辭職。而行政長官之罷免，則須由三分之一議員聯合提案，三分之二議員通過後，交付全民公決。

社會民主連線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人性立法 — 男士侍產假的一些問題(轉載)

劉山青

立法會《2014年僱傭(修訂) 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修訂《僱傭條例》的宗旨，是為了使男性僱員有權就其嬰兒出生，享有最多3天侍產假，產假期間獲得相等於平均日薪五分之四的薪酬。

當局曾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該委員會於2012年11月26日的會議上表示支持。法案委員會在2014年5月10日(星期六)聽取團體意見，屆時有19個團體代表出席和另外的5份意見書。

經驗說，政府所提出的法案都是直通車，議員最多只可以爭取些小恩小惠。除了一些如銀行公會、大律師公會等外，其他民間團體的聲音不會影響其結果。無論如何，此法案的制定，關乎普羅大眾。

大部份的關注是法案的第15D：

15D. 享有侍產假的權利

(1) 男性僱員如符合以下情況，即有權就某嬰兒出生，享有侍產假 ——

(a) 他是嬰兒的父親；

(b) 他在緊接放取侍產假前，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及

(2) (b) 有權就每次分娩放取不多於 3天假期(不論是否連續日子)。

(4) 即使同一胎有多於一名嬰兒出生，亦只視為一次分娩。

(5) (b) 不適用於流產個案。

發表意見的團體，不少為政團，但大多沒有提交書面意見，這或可反映他們不大認真。讓我們看一些書面意見吧。

1.香港空運貨站職工會

其副主席在文件中說：『15D 只能讓他一生中只享有3天分娩假期。』令人摸不著頭腦。原來，他指自己已有2個小朋友，未來最多添丁一個。

2. 明光社

『對於有議員建議將男士侍產假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女同性戀者的伴侶關係，本社認為是魚目混珠。』

大概，女同性戀者的伴侶可以取到男士侍產假的數量無足輕重。這些純為意識爭論。性小眾權益只有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才受到尊重。香港的外表是一個先進體系，實質十分落後。

立法會法律顧問致律政司的信件表示它關注三個法律問題：

一)嬰兒如在香港以外地方出生，僱員須提供該嬰兒的出生證明書，或任何其他證明文件。

但，僱主可能無法理解不同的語言和程序的其他文件。一旦訴訟，會引起司法管轄權的相關問題。

二) 新增第15H(2)條的"average daily wages"未下定義。何不採取第57章就產假及其他法定權益(就是疾病津貼(第35條)、假期薪酬(第41條)及年假薪酬(第41C條))所使用的草擬方式，即"daily average of the wages"。

三) 放取侍產假的模式

根據第57章第6條，產假及年假均不得計算作通知期的其中部分。鑒於條例草案中並無類似條文，如以給予通知的方式終止合約，侍產假便可以計算作通知期的其中部分。 即:若解僱通知期為七天，僱主可否將正申請侍產假的三天放在其中？

勞福局在二零一四年二月給立法會的文件表示：

『(f) 流產及死胎個案 ，據《 僱傭條例 》，流產的女性僱員可享有病假而非產假 。政府建議法定侍產假不適用於流產個案，但適用於死胎個案。』

其後，它又表示：『法定侍產假的政策目標，是讓所有符合資格的在職父親在嬰兒出生前後享有假期， 以照顧嬰兒的母親和初生嬰兒。「流產」的定義是「在懷孕2 8個星期內排出不能於產後存活的成孕物體」。』

正如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意見書：根據政府的粗略估計，港人嬰兒的每年平均為4.7萬個，若給男性僱員侍產假三天，涉及的僱主開支約為1.2億。2013年的實質本地居民總收入為2萬億。放寬流產個案對經濟做成的影響極之有限。

筆者認為，排斥流產個案不近人情。流產肯定對婦女帶來打擊，重則引致抑鬱。立法者認以人道和人性進行立法。

台灣太陽花學運開花結果

振言

台灣大學生在今年3月18日爆發了太陽花學運，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簽署的黑箱作業。經過20多日的抗爭，終於得到了基本上勝利，事件震撼了全世界。

近幾年來，台灣經濟惡化，工資水平退回到16年前，年輕人得到的薪資微薄，一般人生活難以改善，造成對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普遍的不滿。這是學運爆發的主要原因。服貿協議就成了導火線、爆炸點。

這份《服貿協議》最初是在去年5月21日由台灣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黑箱作業簽訂，要交由台灣立法院最後立案。它使台灣的大企業可能得益，但許多人都擔心台灣經濟最終會受大陸控制，使台灣的中小企業受到衝擊和不利，大陸移民會大量遷台工作等等。許多學者都認為問題重重。於是在去年6月25日立法院院長王金平主持的政黨協商會議上達成共識：「應逐條審查逐條表決，……不得予以全案包裹表決，非經立法院實質審查，不得啓動生效條款。」但馬英九最先是：必須全案通過，一字不能改。這就激發起太陽花學生運動，學生們率先起來表示異議。

大學生們佔領立法院，跟著民眾由各地聚集在立法院靜坐聲援，市民送食物、食水等支持學生，民眾準備作長期抗爭，逾62所台灣大專學生到場響應。5日後大眾佔領行政院，號召民眾包圍全台各地的國民黨支部，王金平被迫邀請各黨派協商「拆局」。警方跟著以武力清場，打傷174人，從而激發數十學生團體聯署呼籲各校罷課，工人罷工。

在3月30日，70萬民眾響應學生和民間團體穿著黑衣上街，佔領總統府與立法院之間的凱達格蘭大道，掀起巨大的波濤。如此驚人的巨大參與數字，顯示出馬政府的普遍不得人心，由此造成的群眾巨大壓力，迫使馬英九從拒絕轉為答應與學生對話。王金平更主動探望佔據立法院20日的抗爭學生，發表聲明強調在兩岸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之前，將不會召集服貿協定相關黨團協商會議，審查服貿協議，呼籲學生退場。

學生和民眾們覺得要求大致上達到，聲言如果政府日後毀諾背信，便會再次起來抗爭，於是結束了行動。

這次抗爭顯示出台灣學生們的政治清醒，觸發起台灣的其他鬥爭，打擊了馬英九國民黨政府的威望，會打亂北京政府的佈署，要對台灣當局多作讓步；同時又激勵其他地方民眾今後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的抗爭，例如替香港不久將來發生的鬥爭示範、加溫。

2014年4月12日

後記：

在這次學運結束後不久，台灣再爆發了反核4電廠的抗爭(詳見本期另文)。在5月1日，台北市萬人冒雨遊行，都可視為台灣太陽花學運激勵起社會抗爭的事例。在今年的五一勞工節，台灣團結工聯，勞工陣線等數十個工會及勞團在台北聯合發起「反低薪、禁派遣」遊行，萬人冒雨由凱達格蘭大道遊行至「勞動部」，表達對「工時長、薪資低、沒福利」現況的不滿。而當局較早前表示，擬於明年推動每週工時40小時立法。

此外，積極參與並領導反服貿協議鬥爭的學生代表林飛帆、陳為廷等，於5月18日在台北成立名為「島國前進」的社會運動組織。據發起人稱，該組織將持續就服貿協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自由經濟示範區等議題向當局施壓，並展開所謂「修正公投法」的連署等活動。這個組織的成立，預示出將來台灣社運會多一組織來推動和領導。

2014年5月20日

談學運的守禮與守法(轉載)

廖玉蕙(台灣海洋大學講座教授)

我從十七歲起，便浸淫於最重視倫理與傳統的中文系，以詩經「溫柔敦厚」的詩教自律也以此教學。多年前的我，在軍中教書，每個禮拜四都得集體在大禮堂接受莒光日的洗禮。螢光幕上，他們告訴我，那些從事反對運動的人「居心叵測」；那些追著萬年國代轎車敲玻璃的人「沒有禮貌」、「造反」！

有一年，我一邊在軍校教書，一邊念博士班。一天，在國學大師潘重規教授的課後打開電視機，出現立委跳上議事桌扯掉麥克風的畫面，我正想：「這些人好差勁！教壞小孩，把基本的禮貌都破壞殆盡！」還沒開口，潘教授先就說:「若要讓既得利益者釋出利益或權力，沒有用非常的手段是萬萬行不通的！」我瞿然大驚，心裡恍似有了那麼點什麼東西被啟發了！

過沒多久，萬年國代成為歷史;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國會全面改選；釋放政治犯...，一樁樁、一件件的保守或不公不義都日趨合理，我當初的疑懼才逐漸冰釋。傳統的勢力看似牢不可拔，卻也輸給了改革的毅力；而在反對運動者的努力下得到的成果，似乎並不為所有人所記憶，但走過歲月的我是記得的。我從待過十九年的軍中巨大的謊言機器裡脫身後，向前瞻望並回頭審視，除了欽敬那些先知先覺者，慚愧自己的後知後覺外，也慶幸我還沒有不知不覺。

其實，禮貌與秩序都是文明的表徵，但當執政當局明顯犯規，弱勢的人民又無力招架的勢力不均等狀況下，是環境先不友善文明，逼得民眾做困獸之鬥，這時若還夸夸侈談禮貌或秩序，就真是強人所難了。

《論語》裡，不輕易用「仁」來稱讚人的孔子，卻讚許管仲為仁人，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雖然孔子也曾不諱言管仲沒殉死主子公子糾，反倒當上了敵營齊桓公的宰相是失禮；但是認定管仲匡正天下，人民到如今都還蒙受他的恩賜，相對於這種「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大仁」，知禮也就變成了教條與拘泥。從這番看重實效的全面且客觀評論看來，孔子可以說是古代反對運動的先驅。那些堅持咬死學生是不禮貌的暴民者，也許可以再想一想。

許多人喜歡徵引美國人講究秩序的反對運動，但似乎都刻意遺忘早年他們在社會議題的抗爭的激烈。反越戰時，那些flower children拿一朵花在槍桿子前的照片、舊金山同志的石牆運動.....難道都是手拉手溫柔的抗議？還有些人總是歌頌美國可以恣意逮捕、任意毆打的警察權，但似乎刻意迴避威權的解體、平等的獲得，都是因為堅定的抗爭才得來，絕非警察權的過度動用。

十九世紀美國南方虐待甚至虐死黑人是合法的，因為黑人是私有財產，但合法與非法，還得回歸有沒有正當性，法律得隨著時代的輪軸運轉改變。電影《自由大道》裡的同志哈維，《自由之心》中的黑奴索羅門的血淚創傷...電影具體呈現了時代的痛；我們在電影院裡為這些真人真事改編的人生流下同情的眼淚，卻在走出電影院、回到現實世界後，強調警察打人的必須，會不會太荒謬了！

我真心期待在指責學生不得已的不禮貌、短暫的逾越尺度的同時，也能看見新世代在運動中的「信守承諾」與「井然有序」。

台灣反核四電廠爭取到停建

涓滴

太陽花學運在4月10日退場之後12日，長達30年多番興廢的台灣第四核能發電廠(簡稱核四)的停建爭議又再爆發。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開始無限期絕食反對核四，觸發多個反核團體示威聲援，繼而發展到佔領立法院。

爭拗遠在蔣經國時代開始，因當地居民強烈反對，決定暫緩興建，1992年由李登輝批准復建，4年後開始動工。在2000年陳水扁執政期間，宣佈不繼續執行，但在翌年釋憲後復建，以後又反覆多次。經濟部強調，沒有核四，2018年台將陷入缺電危機，但日本地震引發核電廠爆炸大災難，更令台灣民眾聞核色變，在2013年3月，逾20萬民眾上街遊行，要求政府停建核四。實際上，即使核能發電量大，成本較輕，但弊害更大，對民眾健康生命危害更難以估計。當局應該採用其他各種方法 (如天然氣、火力發電或汽電共生相關規定、太陽能、水力、輸入能源，再加上一向沿用的各種方法)去發電，而不應飲鴆止渴。上述的台灣民眾長達30年的反核四鬥爭，反覆說明台統治者的屢圖逆民意而行，但不得逞。

4月25日，馬英九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公開論戰，馬英九主張先建核四廠，再作核安全檢查，最後交全民公投，蘇貞昌則認為必須立刻公投。馬英九的目的就是拖延公投，而以核四工程完工後的既成事實來迫使人民承認，顯然是在愚弄人民。結果雙方無結果而散。

據《亞洲周刊》主筆南方朔在4月27日指出：台灣這次的反核廢核，絕不止是感性的運動。迄至目前，已有400名學者站出來反核，其中就有7名中研院院士，他們連署了一份「廢核四，爭民主，學界不核行動聲明」，這顯示了台灣的反核廢核是有理智性的行動，反核行動已成了公民團體、居民團體，以及學生運動各種力量整合而成的大型社會運動。

4月27日，反核團體發起遊行，有超過五萬民眾響應，然後，其中2 萬人佔據台北車站前的交通要道忠孝西路，使台北重要交通樞紐完全癱瘓。形勢急轉直下，台灣政府很快被迫宣佈：即日起核四1號機不施工，安檢後封存，2號機全部停工。台北市長郝龍斌稱，會不計用任何方法，即日恢復交通正常。馬英九與國民黨縣市長討論後，決定核四1號機和2號機照台政府上述的宣佈去做，日後是否運轉，則將由公投決定。

這樣一經佔領交通要道，便迅速促成反核四鬥爭的勝利。如果將來台當局違背承諾，勢必再引發反核的鬥爭。

台灣人民祇在最近短期內便有多次的反國民黨政府、起來捍衛自身權益的行動，顯示他們對現狀的非常不滿，也暴露出馬英九統治的無方無能，致使他的威望每況愈下，統治日感困難。這是對統治者的重大打擊，對被統治者則是抗爭信心的持續提高和鼓勵。

民眾一佔領交通要道，很快便使馬政府讓步，這項成功經驗很快便影響其他地方，例如澳門也爆發反特首崔世安提出的《離補》法案，在兩萬人大遊行之後，便被迫要收回。(詳細評論見本期另文)。 應有理由相信：台澳近期的一連串民眾抗爭和一一得到「小勝利」，勢將或多或少激勵香港的人民，有利於不久將來爆發的社會運動，包括佔領中環的實現。

2014年5月15日

澳門人民反「離保」法案獲得勝利

微波

澳門政府制定《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簡稱《離保》法案），容許特首和司長在離任後繼續獲得在職時月薪的7成及3成作補貼。而且特首有刑事豁免權等。在未經公眾諮詢、黑箱作業下，便交立法會審議細則，即予通過。此舉立即激發起澳門民眾強烈反感，有2萬市民上街遊行，表示反對，要求撤回此一法案。這是1989年5萬人上街聲援北京民主運動後，澳門回歸以來，澳門最大型的遊行。在祇有40萬居民的澳門，這確是難能可貴的數字。

在2萬市民上街後，立法會通過接納崔世安的要求，刪除表決法案的議程，惟市民堅拒收貨，堅持要撤回惡法，引致7千人包圍立法會，終於迫使政府轉軟，收回惡法。

成功號召及帶領市民上街並包圍立法會的民間團體「澳門良心」的成員，形容今次是民意小勝，並指出「離補」法案不是個別例子，而是澳門特區政治體制重大缺陷的有力証據，並批評建制派的把持令立法會監督權力名存實亡，淪為政府橡皮圖章。他們呼籲澳門人要團結起來，爭取立法會及特首真正普選，才能避免惡法重臨。這是很正確的意見。

在澳門這塊彈丸之地，政府財政來源主要是博彩。每年收入逾3千億，超越拉斯維加斯6倍，而且逐年增加，使得澳門特首和眾高官薪俸待遇已經非常優厚，幾乎不受監管。「離保」既可以用公帑自肥，又想保護特首免受刑事罪責，反映出特首自己有知法犯法的行為。他們以為每年派給澳門永久居民多些錢，(例如比香港派多些錢) 便可使他們變成順民。

但澳門社會卻是貧富懸殊，窮人以至一般公民並不以此「救濟金」為滿足，他們許多人對這宗「離保」(被澳門人嘲諷為「離譜」) 法案都上街怒吼反對，堅持要撤回。遊行人士指責：現時的高官已經月入幾十萬，如果法案通過，又多幾百萬，我們全民退休保障未有，各種社會保障都未齊，這些不趕着立法，這條法案卻非常趕着設立，真是豈有此理！

又有遊行人士質疑，如果一個人行得正企得正，何以要在任期內享有刑事豁免權，分明是身有屎，已犯了刑事罪！

崔世安之急於在此時推出「離保」法案，主要原因之一，是鑒於北京中央在號召「老虎蒼蠅都要打」，反貪腐之風正吹向港澳，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和中旅集團主管先後被雙規，摩根大通投資銀行部前亞洲區副主席方方被廉署拘捕，涉嫌聘用大陸官二代獲取不正當利益等等，這些都是明顯的新事例。而中央宣稱要「依法治澳」，便會給崔世安利用為有法可依，從而要急速立法以自保，而又可自肥。

據國際傳媒調查報道，中共領導人五大家族流出海外資產高達三萬億美元，除香港這個資產自由進出的國際金融中心，扮演重要的洗錢角色外，澳門也早已淪為國際傳媒報導的洗黑錢中心。同時，澳門的賭業完全公開而合法地一枝觸秀，吸引了無數境外的嗜賭者前來豪賭，絕大多數都會輸得清光，甚至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終生抱憾；這才使得賭業經營者賺得巨額的不義之財，得以把一部份繳納稅款，構成澳門的主要收入，養肥了政府高官。但這樣的不務正業，不力圖發展正常的工業生產，卻並非澳門社會所應走的正當道路。

世界各地，尤其是兩岸四地的社會鬥爭，是互相影響，休戚相關的。台灣的佔領交通要道、佔領立法院行政院、包圍立法院，從而得到勝利，以及香港的許多抗爭，提出要佔領中環等等，都影響了澳門人民的行動和取得勝利，而澳台這些抗爭和勝利，反過來也將影響香港的抗爭和佔領中環及普選等的發展的。

願香港人民不久也以一連串抗爭勝利回應台澳同胞吧！

2014年5月20日

立即無條件釋放法律界和異議人士！

張開

2004年，中國政府在各方壓力下，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內。但這只是官樣文章，在公佈後，雖引起民間嘗試行使人權這一應有權利，卻遭到阻礙、壓制，重演50年代毛澤東號召人民大鳴大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後，人民響應，卻遭到「引蛇出洞」的清算。尤其是現時各級官僚，從中央到各地都會貪污腐化，無法無天，導致無數平民蒙冤受屈，卻得不到法律保護。因而有大量維權的法律界和異議人士起來仗義執言，要為他們依法辯護或爭取人權，但都遭受官僚無理拘禁，控以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國家安全等莫須有罪名判刑，許多人都拘禁數年以至十多年，例如《08憲章》起草人劉曉波便因此而遭判刑十一年，至今仍在專制獄中度日。

無理拘禁不同政見人士和維權律師的專制行動，一直沒有停息，不時都有此類消息陸續傳出，今仍有許多維權律師等人士在冤獄中受苦。

例如，單是在四川省，便有許多位維權人士仍然未獲自由：除了譚作人因調查5.12川震豆腐渣工程而被判入獄，現已刑滿出獄外，領導川震維權的李依乾，曾揭發官員侵吞災民賠款，被當局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監3年，估計要2015年出獄。

此外，參加六四民運、組織《08憲章》簽名的陳衛，則以「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兩次被判刑共14年，2020年出獄。曾組建中國民主黨、撰文批評豆腐渣工程的民運人士劉賢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先後3次判刑，合共刑期長達25年6月，2020年刑滿。

要求官員財產公開的「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與廣州著名維權人士郭飛雄在去年7、8月被刑拘後，3名支持該運動的江西新余市維權人士也同被判刑3年至6年半。

代理上訪媽媽唐慧等多宗維權案律師浦志強，因參與六四研討會，於今年五月被以尋釁滋事罪拘留判罪。連帶其代表律師及友人共3人被疑涉案被刑拘。

廣東維權人士謝文飛、羅向陽、秀才江湖、楊崇、張皖荷，已經全部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後來如何發展，暫未能獲悉。廣州維權人士唐荊陵於6月20日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唐的妻子江艷芳指「是一個『口袋罪』，甚麼都可往裡裝。」

較早之前，北京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拘在私人住宅舉行六四研討會的徐友漁、郝建、浦志強、胡石根及劉荻等5名與會者後，引發國際社會關注。有8位國際知名學者，包括美國黎安友和林培瑞、法國白夏和潘鳴嘯等，在5月17日發表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公開信，呼籲當局糾正錯誤，無條件釋放近期被拘捕人士。

公開信表示，在中國成為世界強國之際，一些公民在未有任何違法行為的情況下被拘捕，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令人不安又費解。公開信也對資深獨立記者高瑜被指泄露國家秘密被捕表示關注。信中說，「自『文革』結束後，黨政分開是一項基本原則，那『黨的文件』如何又成了『國家 秘密』呢？」(此公開信報導，同引自5月16日《明報》。)

中國政府近年來如此打壓不同政見和法律界人士，反映統治者對政局不穩定的憂慮，雖然支出了空前巨大的維護國家安全費用，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依然加劇和爆發鬥爭，比如疆獨在天安門和各地的恐怖襲擊，企圖以不正確的方法對抗民族壓迫和爭取少數民族的真正自治以至分立權；許多地方爆發反對興建化工廠或垃圾焚化爐等的大型抗議示威，和工人爭取改善待遇，原居民反對拆屋、收地、逼遷，小販反對城管人員無理壓迫拘捕等抗爭。不久之前中央實行收緊言論，出版、新聞等自由，發出「七不(許)講」的無理禁令；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於6月18日發出通知，要求各新聞機構對旗下分社和部門，禁止分社跨行業、跨領域採訪報道，禁止新聞記者和分社未經本單位同意私自開展批評報道。網絡輿論隨之嘩然，禁止記者批評即禁止他們履行天職。國務院更發出白皮書，對香港特區一向享有的「高度自治」、司法獨立等自由權利橫加削奪等等，都是官僚獨裁專權的新表現。難怪連前任胡錦濤、溫家寶高唱的「以民為本」， 憁 民之所想，急 民之所急都不多提，却新提出「中國夢」，即「中國的夢想」，這是新統治者的強硬作風，也是一人要兼任十個全國所有重要職權的原因。

物理學和社會運動的規律告訴我們：有壓迫就有反抗，壓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這是屢驗不爽的。

2014年6月25日





水患之聲不絕於耳

破謎

中國人均淡水資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四分之一，屬於水資源短缺國家，而水環境污染、供水績效、用水效率低下，加上勞民傷財的水利工程，使問題更趨複雜，十分棘手。

2014年6月4日，中國環境保護部發佈了《2013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報告指出，中國水源、空氣及土地的品質下降，前景堪虞。[1]

首先，水環境品質每況愈下。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浙閩片河流、西南諸河和西北諸河等十大水系的國控斷面中，Ⅰ～Ⅲ類、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為71.7%、19.3%和9.0%。珠江、西南諸河和西北諸河水質為優，長江和浙閩片河流水質良好，黃河、松花江、淮河和遼河為輕度污染，海河為中度污染。在監測營養狀態的61個湖泊（水庫）中，富營養狀態的湖泊（水庫）占27.8%，其中輕度富營養和中度富營養的湖泊（水庫）比例分別為26.2%和1.6%。在4778個地下水監測點位中，較差和極差水質的監測點比例為59.6%。

二是近岸海域水質總體一般。一、二類海水點位比例為66.4%，三、四類海水點位比例為15.0%，劣四類海水點位比例為18.6%。四大海區中，黃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質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質一般，東海近岸海域水質極差。9個重要海灣中，遼東灣、渤海灣和膠州灣水質差，長江口、杭州灣、閩江口和珠江口水質極差。

另外，城市環境空氣品質形勢嚴峻。依據新的《環境空氣品質標準》（GB 3095-2012）對SO2、NO2、PM10、PM2.5、CO和O3六項污染物進行評價，74個新標準監測實施第一階段城市環境空氣品質達標城市比例僅為4.1%，其他256個城市執行空氣品質舊標準，達標城市比例為69.5%。酸雨分佈區域主要集中在長江沿線及中下游以南，酸雨區面積約占國土面積的10.6%。

再者，土地環境形勢依然嚴峻。耕地土壤環境品質堪憂，區域性退化問題較為嚴重。全國年內淨減少耕地面積8.02萬公頃。中國現有土壤侵蝕總面積2.95億公頃，占國土面積的30.7%。

水效管理低下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北京召開"中國城市水效管理"課題成果發佈暨研討會，公佈由該基金會同環保部、水利部、城市科學研究會、清華大學等相關領域的專家，歷時1年完成的成果報告，從更加綜合性的水效角度，探討完善我國城市水資源管理制度、提高用水效率以及供水績效的相關政策和措施。十二屆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仇保興出席成果發佈會並發表了主旨演講。

仇保興指出，根據國際經驗，城鎮化進程在進入中期階段以後，城市生活用水量不大可能再出現大幅度增加，但是長距離調水帶來的成本過高、對水生態產生負面影響等諸多弊端

[1] '环境保护部发布《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环境报》，2014年6月4日。http://www.mep.gov.cn/zhxx/hjyw/201406/t20140605_276496.htm

正日益顯現。城鎮化率50%時期是水污染的高發期，也是治理水污染的關鍵期，解決城市水安全，主要應從水生態修復入手，進而提高水的使用效率。他表示，通過城市節水、提高工業用水重複利用率、降低供水管網漏損，至少可提高城市用水效率15個百分點以上；通過城市污水處理就地回用、雨水收集利用與海水淡化等措施，至少可增加城市供水量15個百分點以上。

仇保興還表示，中國農業用水量占全國水資源利用總量的61％，而有效利用係數僅為0.51，發達國家這一系數為0.7至0.8。如果中國農業節水10％，城市水資源緊缺狀況就可以得到大大緩解。”[2]

南水北調，調不過來[3]

前中國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在《給水排水》雜誌發表署名文章，點名批評南水北調工程。

仇保興寫道：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中國的城市建設發展帶來用水量突增、城市水資源緊張等問題，中國許多地方都採取了外部調水的辦法來解決缺水問題，如引黃濟青、南水北調、引漢濟渭等。隨著調水規模越來越大、距離越來越長，帶來了調水越來越困難、調出地水生態破壞越來越嚴重等諸多問題；同時，外調水工程量大、投資和運行成本高，調來水與當地水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越來越多，一些地方出現了調來水與當地水成分差異導致自來水管道內的水垢溶解析出，形成了新的污染，且相當難以治理。所以，以長距離調水解決水資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陷入困境。”

仇保興還援引了前蘇聯時期阿姆河、錫爾河引水項目與鹹海遭遇的例子，來說明不當調水引發的生態災難。

據報導，南水北調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工程橫穿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四大流域，涉及十餘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輸水線路長，穿越河流多，工程涉及面廣，包含水庫、湖泊、運河、河道、大壩、泵站、隧洞、渡槽、暗涵、倒虹吸、pccp管道、管道等水利工程項目，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巨型水利工程，其規模及難度國內外均無先例。

不過，大陸環境污染嚴重，眾多癌症高發區與當地化工廠等排放污水有關。該工程東線和中線均流經環境污染嚴重地區，尤其流經眾多癌症高發地，未來進入北京等城市千家萬戶廚房餐桌的南水，將是污穢不堪甚或致癌毒水。南水北調或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致癌工程”。



[2] 《科技日报》，2014年06月20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4/06-20/6303128.shtml
《中国建设报》，2014年06月30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4/06-30/6332750.shtml

[3] <比三峽工程更可怕的“南水北調”>, 2014-06-11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3171234.html

談談裕元罷工

青岩



2014年4月，東莞市高埗鎮裕元鞋廠4-6萬名工人參與罷工。工人要求公司補交多年來未能如實繳納的社保、大幅度提高工資、簽訂勞動合同。

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宝成国际集团）由1970年代經營初期的純代工製造(OEM)轉型為代工設計製造(ODM)，代工的主要國際品牌包括：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Merrell、Salomon及Timberland等。

根據裕元工人的講述，他們成型車間95個人，每天工作12個小時，必須生產2400雙耐克鞋。根據裕元集團2012年年報，一雙在中國製造的耐克或者阿迪達斯鞋，工人能得到的全部酬勞僅18.6元。而一雙鞋的平均售價約為620元，工人的薪酬僅僅占到了3%。換言之，品牌商和零售商攫取最大的利潤。

裕元偽造勞動合同，拖欠社保已有近20年。當有一位繳納了15年社保的老員工退休之後只能拿到每月400-500元的養老金，工人才發現廠方拖欠社保款項。有一名老員工每月總收入約3000，廠方應為他繳納社保330元，但是工廠以東莞每年最低工資為基礎繳納社保，即今年181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每月才繳納27.15元。

罷工意義所在

潘毅撰文<裕元工人的團結鬥爭>指出，“工人為了爭取社保而團結鬥爭。城市社會保險，包括養老、醫療、生育、工傷、失業，是維持一個城市無收入人士的基本生活的保障。這次行動代表著，農民工從農村早已進入城市，要求在城市中生存、生活下來，這是他們對於從農民工徹底轉化為新工人的一種吶喊。”

文章分析道，被拖欠社保的不僅是流水線上的底層工人。除了來自台灣的高層管理，所有中高層管理的利益都被嚴重侵犯，這也是此次保衛社保的罷工行動能夠有如此之大影響力的關鍵。

Ashok Kumar撰文<裕元對跨國資本主義的影響>[1]指出，本次罷工規模大、時間長，是全球資本構成上的一個歷史轉折。這次罷工不僅對中國供應商的老闆、而且對跨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他認定這是現代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罷工。工人已經拒絕老闆的小恩小惠，而且現在罷工的影響已經蔓延到臨近的省份。正如Jacques Rancière所言：“今日全球資本主義的統治有賴於一個這樣的中國共產黨，給予去當地語系化的資本主義企業廉價勞動力以降低成本以及剝奪工人們自我組織的權利。”由於罷工，中國的平均工資自2009年以來每年上升17%，現在是2000年的近五倍。這次空前規模的罷工只會加深工業資本主義的危機。

他分析中國政府對罷工的鎮壓有所緩和。儘管在裕元也有逮捕發生，但是近些年來，中國政府不像幾十年前那樣對工人的激進運動進行壓制。過去5年，中國的消費債務增長了67%，遠高於美國同期的10%，由此催生了新興的虛假經濟。201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認為

[1]聶舒譯自 http://wire.novaramedia.com/2014/04/5-reasons-the-strike-in-china-is-terrifying-to-transnational-capitalis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的過程當中，更重視國內投資以及試圖終結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資本有賴於中國政府繼續扮演其買辦的角色；一種試圖終結這種配置的轉變會打破工業資本主義的底限。

再者，他認為品牌商和零售商轉向另外的血汗工廠的代價過高。鞋類產業仍然保持著明確的"買方驅動"，這意味著並非生產供應商，而是品牌商和零售商是全球價值鏈的驅動者。現時，寶成工業及其子公司(下稱「寶成國際集團」)為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及休閒鞋製造商，鞋類年產量超過3億雙，約佔全球運動鞋及休閒鞋市場以批發價格計算之20%。因此，跨國品牌和寶成集團之間不僅僅是"買方驅動"的關係，而是互相依存的。現在，阿迪達斯、耐克這樣的公司離開像寶成這樣大規模的供應商要付出的代價非常巨大。

另外，消費耐用品的價格在上升。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經濟危機以來，後工業化西方經濟從迅速增長的債務以及諸如鞋之類的便宜消費耐用品中獲利頗豐。中國工人通過罷工提出更高的要求，人工成本及消費品的價格將會提高。加之實際工資、資產價值的下降、服務及工業部門自動化的加速、債務理財的減少，將會導致購買力的驟然下降。正如控制著中國向美國出口額4%的利豐集團CEO Bruce Rockowitz在2011年所言，"這是便宜貨時代的終結。"Rockowitz繼續陳述，沒有別的可替代的世界工廠會像中國南方這樣遏制成本並正在經歷著嚴重的通貨膨脹。

工業資本的泥沼

當下 "這樣遏制成本並正在經歷著嚴重的通貨膨脹"的中國，其實正在重複著19世紀末工業時代的俄國，當時的罷工浪潮此起彼落。列寧<談談罷工>（1899年底）描述當時俄國的經濟危機與相伴的勞資衝突: "近年來俄國工業生產發展得很順利，工業大為"繁榮"，但是現在（1899年底）卻有許多跡象清楚地表明"繁榮"就要變成危機了，譬如商品滯銷、廠主垮臺、小業主破產、工人災難重重（失業、工資降低等等）。"

罷工乃既必然又普遍的現象。他說 "近幾年來，俄國工人罷工的次數明顯增多。沒有一個工業省份不發生多次罷工的。在大城市裡，罷工根本就沒有斷過。"

他分析道， "罷工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造成的，但是它標誌著工人階級反對這個社會制度的鬥爭的開始。"

那麼， 列寧提問: "罷工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列寧根據歐洲和美國的工人運動的經驗得出: "事實上，沒有一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的國家，沒有發生過工人罷工。在歐洲各國和美國，工人處處都感到單獨行動沒有力量，要反抗廠主，只有聯合起來，或者舉行罷工，或者以罷工相威脅。資本主義愈發展，大工廠發展愈快，大資本家對小資本家的排擠愈厲害，工人就愈需要聯合起來進行反抗；因為失業現象愈來愈嚴重，資本家之間力求進行廉價生產（要廉價生產，付給工人的工資也應當儘量壓低）的競爭愈來愈激烈，工業波動和危機愈來愈厲害。在工業繁榮時期，廠主得到很多利潤，卻沒有想到分一點給工人；但是到了危機時期，他們倒要把虧損轉嫁給工人。"

當前， "歐洲各國和美國"已躍升至金融資本主義，而像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卻重複19世紀歐美勞資衝突的故事，只要把上述列寧的分析中"在歐洲各國和美國"換上 "中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便是今日中國的真實寫照。

寶成工業聲稱: "為能分散生產基地及善用海外地區較低廉之生產環境，寶成工業透過轉投資之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1980年代後期陸續前往中國、印尼及越南等地設廠。"

換言之，今日的中國與印尼，是否就是明日的越南? 全盤承受追逐工業資本必然帶來的社會矛盾與環境惡化的苦果?

迫在眉睫的問題是: 中國、印尼和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如何不受金融資本的操縱，也不陷入工業資本的泥沼?

中日民間應該聯手反對軍國主義

秋月

今年 7 月 1 日，香港 51 萬市民上街，要求改善民生，推進民主政制。同一天，日本東京 1 萬市民聚集在首相官邸前舉行示威，抗議安倍晉三試圖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示威民眾高呼“安倍下臺”，“打倒安倍政權”，“反對法西斯”，“堅決反對破壞憲法”等口號，有人手持“決不把孩子送上戰場”的橫幅。

提起日本的軍國主義，我想到三、四十年代的時候，我在上海織綢廠工作。1937 年 8 月，日本飛機轟炸上海市中心，床邊的窗戶玻璃給震碎了，我和母親慌忙逃難，路上看著轟炸機在頭頂飛過，落下炸彈。我們拿著卷鋪，從滬東趕往滬西，想到父親不知生死，邊走邊哭。

抗戰時期，無論是日本人開的紗廠，或者是中國人開的織綢廠，工人都是被剝削得很苦的。我上班，我父親去輪候買大米，每人只能一個大洋買一包米。他把一個大洋放在棉襖裡，輪到他的時候，伸手一掏，發現沒了，小偷技藝高超，在棉襖上劃了一刀，偷走大洋，但是沒割破貼身的一層內衣。當時，有錢也沒法多買大米。我們在工廠上班，要求不要發工資，要發大米。

抗戰時，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主張抗日。不抗日，就是漢奸。我也聽到很多日本人在上海的暴行，據說把活人跟死人一起活埋，中國人的命不值錢。但作為工廠工人，我們不分日資、中資，一樣被剝削。我的朋友羅麗萍的哥哥是工廠經理，我幫忙花了很大力氣接駁好一吋的斷線，連一分錢的獎賞也沒有。那時候，學徒更受剝削，學師一年內拿不到什麼工資，之後，要做滿多少碼的綢緞，才拿到百分之二十的工錢，百分之八十屬於老闆；再後，分到百分之四十，再逐步提高。

今天，日本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就是走上戰爭的道路，戰爭爆發，受苦的是平民百姓，用上核武，人類也可能滅亡。

所以，我主張，中國和日本的人民，要聯手推動和平運動，反對兩國國家增加軍費、煽動仇恨。全世界的人民，要聯合起來要求全面廢除核武器。同時，現在全球的社會矛盾很嚴重，中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很多城市拆遷，把窮人趕走，讓地產商投機發達。我看到王晶在電視上得意洋洋，他家財億萬，但是他的錢從哪兒來，我聽說他母親與江澤民的妻子有親戚關係，難道不是靠權力勢力嗎？因此，簡單的“反日愛國”不能解決國內嚴重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問題，反而會轉移了社會鬥爭的焦點。

解決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是相關的。我們不能讓中日戰爭重演，也不能讓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

2014 年 7 月 3 日

波斯尼亞圖茲拉：構建團結

米洛居布·拉多米洛維奇

2月5日，圖茲拉州的政府大樓遭人放火，是對罪惡的私有化，工資的拖欠和腐敗統治寡頭的抗爭。 暴力被視為是必要的，因為人們希望他們的聲音最終為世界聽到，並克服貧困。部長們已辭職，人們已控制了政治生活。 不久，有700多名市民聚集開大會，他們在那裏直接行使民主。 這種“圖茲拉效應”在整個波斯尼亞 - 黑塞哥維那的鄉鎮蔓延.....而這種暴怒已經觸及到克羅地亞、黑山、馬其頓的街道，其方式就像我們已經說過的，如同在法國和歐洲的巴爾幹之“春”。

但在圖茲拉，情況不只限於單獨的一個季節。 人們等待這一刻已經二十年了。 這種情況被一些希望支撐著，人們希望更好地去把握現實 --- 而不被一個進行中革命弄得頭眩目暈。 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問題，要為最終的政治和社會正義建立穩固的基礎，步驟是非常具體的。

專訪法學家和波斯尼亞政黨“左翼（Lijevi）”的創始成員之一米洛居布·拉多米洛維奇（Miroljub Radomirović）。

在“大會”後的第一個星期，圖茲拉公民成立了工作小組，分為一些部門：財政；工業，能源和礦業；工作和社會政策；衛生；教育，體育和文化等。你在法律組。 你能談談它嗎？ 什麼是你們的目標，未來幾個月的優先事項有哪些？

首先，重要的是把司法行政工作小組同圖茲拉大會的法律團隊區分開來，前者的目的是指出在司法行政方面的問題。 對於大會，這一法律團隊是非常重要的。 它修改每個工作小組的要求，以便以正確的方式制訂它們。 我們檢查規範各部門的法律，我們要確保這些要求滿足各個負責某一特定問題的部門的法律標準。 因此，工作小組的要求須是具體的！ 我們已經力促政府檢查我們州的所有私有化合同。 如果事實證明，這些合同沒有得到尊重，它們將必須被取消。起訴一些破壞公司的客戶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使這些客戶尊重了合同。 我們必須確保這些措施立即啟動。

你們已經贏得了勝利.....

是的，由於“白麵包”的取消，我們討回來100萬BAM（可兌換馬克，相當於500 000歐元），“白麵包”的意思是部長們在任期結束後仍然賺有一年的工資。 我們有其他的措施消除不同的“獎金”，這類“獎金”是多年來由腐敗和無情的精英們選出來的。 我說的是部長們，但是還有議員。 我們的工作小組將嘗試提出一系列的修訂.....，所以是我們在作出修訂，而不是他們。 每一天，我們都有新點子，所以對未來幾周，我們並不缺乏舉措。

你參與了大會的法律團隊，你也是“左翼（Lijevi）”黨的創始成員。 能告訴我們，你的黨是如何誕生的嗎？

在反對黨時期，我們都是社會民主黨（SPD）的成員。 我們有相同的目標，相同的敵人。 但是，2010年社民黨勝選，它與民主行動黨（SDA）組成了一個聯盟。社會民主黨給予了我們大量的希望，但我們極為嚴格，結果就離開了。 我們首先成立了非政府組織"造反者（REVOLT）"，批評他們違反承諾。 但非政府組織漸漸地失去了它的銳利性和政治進取性。 因此，我們決定建立一個真正的左翼黨。 我們進行的是反對私有化，反對破壞工廠的鬥爭。 必須取消私有化合同，贓款必須退還給國家。在我們提倡的經濟中，公共利益部門屬於國家，處於社會的控制下。 我們的第一個行動是聲援DITA工廠的工人鬥爭。 在他們擋住工廠時，我們幫助他們在媒體發聲，提供法律援助以及食品。

這個時候，工人們團結一致嗎？工會怎麼樣？

到現在為止，面臨著同樣問題的工人之間沒有真正的團結。 各人都自己顧自己。 我們同工會有麻煩，其中的90%都已經腐敗。 如今，因為工人可以在大會直接表達意見，情況正變得輕鬆。 他們不盲目地支持工會，工會目前受到挑戰。 有些工會想與大會的組織者們建立一些合作。 但大會不會以這種方式工作。 沒有指定的功能，也沒有代表。 關係需要改變。

大會為圖茲拉的左派開啟了空間嗎？ 它是否能夠鞏固"左翼"黨？

我越來越樂觀。 公民論壇已遍佈全國，儘管當局和媒體竭力抹黑他們。 我感到特別高興的是，由於我黨同志的想法和承諾，他們也開始獲得越來越高的聲譽和公民的信任。 你應該知道，在這裏，在前南斯拉夫，有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那樣的烙印，如果你散佈這些價值，就會有大的不利。 然而，人們向我們走來，他們對我們的黨感興趣。 與此同時，情況是如此糟糕，每一個希望都落在左派身上。

今天追求起義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我們必須在街道上維持壓力，與工作小組並行。今天發生的事情是經過多年鬥爭的結果。 政府不能再像過去的20年裏那樣，以傲慢態度行事，忽視工人的要求。 在選舉之後，我們的大會作為論爭的力量，也是真正的另類選擇，將繼續下去。 權力是我們的。 目前的挑戰是，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共同的力量，要建造一個有凝聚力的社會。

採訪者卡斯阿·阿勒克司科（KASSIA Aleksic）和伊維卡·姆拉德諾維奇（Ivica Mladenovic）



突尼斯："勝利雖苦澀，但真實不虛"

對話：阿楞·貝爾哈德、彼得·德魯克

突尼斯民主婦女協會（ATFD）前任主席阿楞·貝爾哈德，是一名兒童精神科醫生，也是隸屬於突尼斯總工會（UGTT）的大學醫院醫師全國聯盟的成員，是第四國際突尼斯分部的一個長期活動家。突尼斯 2010年12月起義爆發後三年，貝爾哈德仍然在突尼斯社會鬥爭中看到了令人希望的動機和活力。 "革命仍在進行。"但是人民陣線在2012年10月的形成，仍然只開啟了極少數的政治前景。

不管怎樣，貝爾哈德高興的是，由原教旨主義的復興黨主導的政府被趕下臺，而所通過的憲法，制止了對世俗主義和婦女權利的威脅。

據貝爾哈德的看法，同阿拉伯復興黨作鬥爭，是絕對必要的。"我相信溫和的伊斯蘭教，它有進步的解釋，但不相信溫和的伊斯蘭主義。"儘管突尼斯伊斯蘭主義有它的異質性，但它連帶其所有不同的傾向，都要以宗教的名義執政，強制社會的伊斯蘭化，要"伊斯蘭教干預個人生活的細節"，"以真主的名義統治社會" --- 從政治人物壟斷宗教並以它的名義進行統治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完了"。

突尼斯人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形成了對原教旨主義政權的意見：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與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締結的協定，它的腐敗，還有它的無能導致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生活成本高，失業，通貨膨脹和債務，可是付出代價的卻是最貧窮的社會階層。貝爾哈德作為一名醫生，每一日都見證了"那些搖搖欲墜的公共衛生服務。"不是改革和拯救這個系統，而是相反，阿拉伯復興黨的部長們從自己人裡雇用"數量龐大的顧問"，以低廉的價格把國有企業變賣給自己的親友。在任何情況下，貝爾哈德都沒有看到經濟的解決方案，"除了包括整個馬格裡布（Maghreb）的新發展模式。"

該阿拉伯復興黨政府被民眾抗議者推翻了，原因不僅是經濟危機，而且還因為他們打擊了婦女的權利和藝術自由，他們想強推突尼斯人陌生的社會模式，比如結束與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協定。 它被推翻，是因為所有這些原因 --- 還有因為它主導的暴力行為，最終導致人民陣線領導人喬寇里·貝萊德（Chokri Belaid）和穆罕默德·布拉姆（Mohamed Brahm）的被謀殺。 根據貝爾哈德的看法，儘管阿拉伯復興黨本身沒有殺他們，但對左派使用暴力的薩拉菲分子（Salafists）和復興黨之間有相當密切的聯繫。她引用阿拉伯復興黨部長們的兒子為例，那些人是眾所周知的薩拉菲武裝分子，阿拉伯復興黨民兵（"保護革命聯盟"），他們襲擊工會運動，有一個視頻在網上流傳，在該視頻中可以看到阿拉伯復興黨成員在一個薩拉菲分子聚會上說："要有耐心"

人民陣線

貝爾哈德認為，關於在革命過程中的民主和社會任務的銜接，關於所需要的聯盟類型（統一戰線？），缺乏理論和政治上的清晰度，除此以外，在極大程度上還有薩拉菲分子的威脅，導致人民陣線領導人 ---它在開始的時候是那麼有生氣，彙集了幾乎所有的激進左派 --- 並與自由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許多前本·阿裡獨裁政權的關鍵人物結盟。

薩拉菲分子（Salafists）的暴力和威脅是真實的，它表現了"精心策劃的灌輸恐懼的政策。"但陣線領導人的反應是選擇接受警方的保護，而警方總是被視為前獨裁政權的勢力 --- 因為"基於事實的過渡期司法"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任務。

因此，人民陣線的形成是一個"重大成就"，在最貧窮階層看來，它不像是一個可能的第三條道路，一個原教旨主義以及世俗資產階級勢力的替代者。 它迅速融入了統治秩序，它受到美國大使的接納，就是象徵。

此外，事實上，對薩拉菲暴力的恐懼，並不是對人民陣線右傾化的唯一解釋。 貝爾哈德

引用了其它方面的因素：幾乎所有的陣線成分，尤其是"那些沒有修正的舊傳統"的組織弱點。在人民陣線的政黨中，你可以看到各種派別，包括過去的親阿爾巴尼亞者，毛澤東主義者，史達林主義者和崇拜薩達姆的民族主義者。這導致思想混亂，可是人們還沒有質疑這些混亂的準備。 相反，混亂使支持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趨勢加強。

這種混亂的表現之一，就是人民陣線和資產階級政黨突尼斯之聲（Nidaa Tounes）組成了救國陣線，接納前政權的成員。 所以貝爾哈德認為，戰勝復興黨，這個勝利是"苦澀的，很偏面的，但是真實的。" 如果結果是"實現一個自由主義的政府，"那就會變成一個"傷心的勝利。"

工人左派聯盟（LGO），第四國際突尼斯小組，在其最近的會議上，譴責人民陣線，同時選擇留在那裡進行鬥爭。 貝爾哈德沒有看到太大的希望。 三，四個反對救國陣線的組織已經離開了人民陣線，只留下工人左派聯盟（LGO）作為一個小而孤立的關鍵力量。有幾十個成員，尤其是年輕人，甚至離開了工人左派聯盟(LGO)，在人民陣線之外另立一組，嘗試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的左派聯盟 --- 但貝爾哈德並不看好其前景。

貝爾哈德擔心一個"艱難的選舉進程。棄權的水準可能會非常高，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間。"考慮到仍然頗具實力的伊斯蘭主義者，他們有精心準備的結構 --- 清真寺，可蘭經學校和慷慨的資助 ---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他們仍然是得益者，有"選舉日倒退的風險"。

社會運動

仍然存在"活躍"的社會運動，尤其是強大的突尼斯總工會(UGTT)。突尼斯總工會(UGTT)前領導的很大一部分是當權者的支柱，儘管如此，貝爾哈德還是認為，該聯盟現在是 "該國的主要社會力量"，大多數突尼斯總工會(UGTT)領袖是抵制本·阿裡的活動分子。 但現在"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角色，不再捍衛其代表底層的政治力量的理念。得益于此，自由民主黨現在掌握了權力。"

突尼斯總工會（UGTT）的內部運作沒有任何改革 --- 貝爾哈德作為一個處在其中間領導層的女人，經常看到其後果。突尼斯總工會(UGTT)是"一個性別歧視非常嚴重的地方，"她說：工會成員的44%是女性，但只有1%到3%的工會領導人是婦女，而且在執行委員會沒有一個女人。為了在突尼斯總工會(UGTT)內爭取性別平等，大會期間貝爾哈德遭受了各種謾罵。

另一方面，在突尼斯有一個相當強大的女權運動，包括貝爾哈德任主席的突尼斯民主婦女協會（ATFD）。 因為新憲法，女權主義者"避免了最壞的情形。" 憲法肯定了婦女的工作權，有權防止暴力，有權在各種選舉產生的機構內獲得平等待遇，有權獲得平等機會。 但"並不能保證真正的平等，而且敞開了大門，給婦女權利有不同的解釋。" 例如，在制憲會議上關於家庭的辯論，女權主義者輸了：她們想確定個人自由組織家庭的權利，但最終文本斷言，"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必須由政府保護。 "這就是為什麼女性接受暴力的原因"，目的是"保全家庭。"

在突尼斯，丈夫仍是一家之主，父親的監護權仍然是常態，在遺產分配上，有對婦女的歧視。 貧困的女性化在繼續和加速。 暴力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影響到近二分之一的突尼斯婦女，沒有真正的方法可以打擊這種現象。突尼斯法律仍然允許強姦未成年人的男人與受害者結婚而不被定罪--- 甚至受害女孩僅是13或14歲。

此外，要求實施消除一切形式的對婦女歧視的國際公約，讓伊斯蘭主義者看到了引入同性婚姻的企圖，他們正在讓這一點成為反對女權主義運動的基礎。

這個需求尚未在突尼斯的議程上，儘管有恐嚇，突尼斯民主婦女協會（ATFD）仍要求同性戀合法化，還有一些小的同性戀和交叉性戀（LGBT）群體和個人自由捍衛者也開始出現。

突尼斯，2014年2月15日

21世紀初的不斷革命和反革命--- 我們的任務

2014年2月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關於世界局勢的報告

這是2014年國際委員會關於世界局勢的討論報告，它所處的局勢是前三年的繼續：我們繼續處在2008年至2011年間開始的情況，處在金融和經濟，生態和社會層面的危機中； 一個全球不穩定時期，各個機制的不穩定深刻而廣泛，令人印象深刻的群眾運動直到阿拉伯地區的革命進程.....，而在同時，這個時期大為缺乏成型的進步開放的政治。 很明顯，對一些發展問題，要進行更詳細冷靜的考慮。這裡分為三個部分討論這些問題：

1.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機制，兩難和矛盾；

2. 這場危機引發的動盪的不同方面。

3.我們作為一個政治流派，同我們利害攸關的是：如何參預階級鬥爭的當前變換，如何參預群眾起義這個真正革命的進程，這是一方面，還有，要如何面臨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弱化的整體過程，比如被剝削群眾作為一個整體，如何面臨反革命機制的興起以及社會環境組織的破壞？

1. 世界經濟危機 --- 我們在哪裡？

1.1 危機特性

2011年2月在這同一個國際委員會上，弗朗索瓦·薩巴多（François Sabado）就2007-2008年爆發的危機問：“過去已知的所有資本主義危機，其接踵而來的都是暫時的衰退，這一幕金融危機的情節也會類似嗎？ 抑或它是兩個層面上的制度性危機：因為發展了三十多年的金融積累王朝已經筋疲力盡，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地球及其自然資源的有限性極限。”而在第二個假設的情況下，可推出直擊問題根源措施的緊迫性：整體上重組生產和社會的反資本主義的措施，使陷入這種螺旋式危機的人民的基本需求得以滿足。

三年後，雖然有點後見之明，我們或多或少的主觀印象，以及最近在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IIRE）經濟研討會上那一類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討論，都指向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的定義。 而且，在持相反主張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很少有人感到樂觀！

有很多方法把當前的危機定義為制度性的。我把目光留駐於那些我們接近的經濟學家上：蜜雪兒·胡森（Michel Husson），他立基於曼德爾界定的“生產秩序極限”[1]，或以撒·約書亞（Isaac Joshua），他講的是“第三型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 [2]。 這裡漫話危機的歷史如下：

19 世紀的危機，可以做競爭力的調控，辦法是殘酷降低原材料費用，價格和清償債務，而在這一切之上的是降低工資，儘量壓低它，在資本的顯著破壞之後，依賴一個或幾個驅動性生產行業，可以讓利潤復蘇。 這些危機是激烈而短暫的。

1929年的危機是非常強烈的，時間也很長。資本主義進入工薪者為主流的時期。 因此，在生產過剩危機的時候，在小生產的環境下，不再有任何生產和消費的累積崩潰可以被稀釋淡化掉。 最初的影響倍減，通過競爭退出危機變得不可能。 積累不再是內生於經濟運行，而本質上是由於政治因素 --- 具體地說，是戰爭及其結果，使資本主義的積累全面重起。

當前的危機似乎比較不那麼強烈.....但它的長度也起伏不定，其終點尚在未定之天！

目前制度性危機的基礎有哪些？ 為避免像1930年代和1940年代那樣的新陣發性危機，資本主義在20世紀下半葉所採用的對應措施，是一般所稱的"福特主義"，國家對工資關係，對市場和貨幣的調控，進行經常而普遍的經濟干預。 而當20世紀60年代中期利潤下降時，一種新形式的資本主義危機在20世紀70年代形成，福特調控有效地保護了制度免受以往危機的暴烈影響，但代價是延緩了利潤的恢復。

從1980年起，借由大規模失業和金融全球化的複雜性，"新自由主義"重新啟動資本主義的攻勢。在需要顯著提高剝削無產階級的速度之前，已經有超過30年的時間，跨國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加劇了資本主義競爭以確保資本的再生產。 金融資本對人與自然的掠奪力量已經達到空前的地步。 在全球化的工業，農業和服務業中，這股力量積累了新層面的雇傭奴隸制，它是主導經濟裡的"剝奪式積累"，滲透進最週邊社會，攫取其土地和壟斷其出口，造成一個對整個世界生存條件進行破壞的新階段。

因為工業和商業保護主義的成分非常顯著，世界經濟的自由化在某些方面比在19世紀末更加激烈。但是，國家的作用不具可比性（在1913年，國內生產總值中公共開支的比例，在美國和法國不到9%，相比現在，它分別超過30%和50%）。 它在目前的動盪中，仍然是特別的，尤其是央行的干預行動，先要強調的是，在目前的"新自由主義"和19世紀自由主義的古典時期之間，它構成一個本質的區別，。

這種新自由主義的運作，使剝削得以恢復，從結構上和地域上延伸商品空間，利潤也因此增加。 但投資資本的效率並沒有隨之而行，儘管速度快和數量多，卻沒有任何創新驅動鐵路，電力或汽車的發展。 從這個角度看，讓我們記住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所闡述的悖論："你可以看到電腦時代無處不在，但除了在生產力的統計上"。 這種缺乏效率的特性，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利潤增加的難度，導致整體投資變動，從而使積累從危機中真正退出。

一時間，信用經濟允許的增長足以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即這場危機是可以克服的，但世界各大經濟區之間的增長差異有所增加。 最後，全球化也產生了把經濟不穩定的動態延伸得更為迅速的效果！ 因此，矛盾激化了。 就像以撒·約書亞所說的那樣，"一方面是政府的干預，另一方面，是工資和價格上的脆弱靈活性，兩者減少了當前危機的廣度... 相反，生產資本的全球化和實體經濟的金融化，增加了不穩定。"

對消費具有負面影響的強大工資壓力，極為複雜的信用經濟和資本主義區域的擴展，暫時對這種生產產出效應作補償。但我們現在知道，當前危機之前有一個利潤率轉機。 截至2007年底，信用經濟和廣義投機達到了極限，並導致了始於著名的"有毒信用資產"的金融泡沫破裂。 此後，虧損由銀行轉移到公共財政，政府的理由是 "拯救經濟"，這個做法允許資產階級奪回主動權，發起對公共赤字的攻擊。

這個趨勢導致了非常強硬的緊縮計畫隨處可見，不過傷害最大的是歐洲。 這些方面已經大體上討論過了。 我們當時得出的結論是，在起初的大消費背後，占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仍然牢固地坐落在新自由主義上，而完全不轉向凱恩斯主義。 因此，打擊投機活動的銀行監管改革似乎非常有限，而銀行業務的集中變得驚人：美國最大的投資集團黑岩（Black Rock）管理的資產價值，接近德國的國內生產

總值；三菱銀行，德意志銀行，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和法國巴黎銀行（按降冪排列）則接近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那麼，在2013年有什麼樣的結果，在2014年會有什麼樣的前景？

2013年的經濟增長仍然疲弱，不同國家的衰退深淺不同。 然而，債務危機似乎現在已受到控制，而今年也已見到了緩慢的恢復性增長，但問題是如何穩固？於是有一個問題出來了：歐債危機將預示著該制度的一個新的深度脆化？抑或從重新整合在淨化基礎上的資本的角度來看，這是最後一個必要之惡嗎？ 這要把幾個因素考慮在內。

1.2 根據主導的中央銀行的作用，情況非常不同

在美國，美聯儲用貨幣擴張，對抗經濟衰退（大規模收購金融證券，貸款利率非常低，即所謂的"導引"利率），在2009年的經濟暴跌後，今年它導致各地恢復了3.5～4%的增長，但有明顯的脆弱性：新的泡沫 --- 房地產或互聯網 --- 凶像已露。

在中國，央行也不斷用金錢來創造通貨再膨脹以刺激經濟，而增長率再次企高（7-8%）。但連帶著新的脆弱性：銀行和地產，猖獗的腐敗，競爭力的喪失。在美國還不止於此，對銀行倒閉及其未知的後果，人們懷有恐懼。

在全球，歐洲是資本主義的"病夫"：歐元區所受到的最大威脅是，彙集資本主義大雜燴的體制大廈的脆弱性，以及把危機擴大到意外程度的貨幣和信貸政策。 國內生產總值的發展差異達到創紀錄的水準（2007年北歐增加3%，而南歐則減少9%）。 即使2007年以來它們沒有減少，公共和私人債務卻似乎深受歐洲央行和新調控工具（歐洲金融穩定基金，歐洲穩定機制）的緊壓，因為後者使用仍然嚴格的貨幣政策，緩和借貸利率的緊張情況。 被貶責為"歐豬五國"的國家，南歐和愛爾蘭將受到控制，以換取大幅度的"債務清償"。 德國和北歐正在做得夠好，但法國正經歷20世紀中期以來前所未有的社會攻擊，而且財政競爭的壓力無處不在加強。 在2013年的停滯之後，我們會看到一個資本主義解決方案的開始而讓所有雇主獲利嗎？或者至少是一個衝擊，一個危機新階段的真正通貨緊縮（經濟壓縮情況下的物價和工資的下降）的猛烈出現嗎？

大型央行的政策對其他經濟集團，對老牌（日本）的或"新興"（東亞、印度、巴西和拉丁美洲、俄羅斯、土耳其）的經濟體有影響：他們不但不是獲勝者，相反，他們會不會是美國及中國開始復蘇以及貨幣巨大差異的受害者？貨幣市場確實表現得很狂熱，其中一些經濟體如阿根廷，印度和俄羅斯在2014年初被美國或歐洲的動盪困在邪惡中，因為貨幣和金融的戰爭動搖它們。

1.3 工作、失業和利潤

各國都用經濟危機這個因素把統治階級的進攻合理化。 為獲取競爭力而反對人民權利和社會利益的鬥爭，為環境商品化的鬥爭，把國家規則改變，而這些規則仍然服務於新自由主義的管制放任做法。

這種進攻依賴於大規模的失業，失業人口還在增加（全球超過2億人），歐洲最多：歐盟有2600萬失業者或勞動人口的11%（德國有6%，而歐洲南部大陸則有20%的失業者）。 而且不穩定的就業普遍上升。 在這些領域中，婦女以及青年受影響最嚴重，因為這兩種人是全部臨時工作方案的首批受試者。

爭奪國際投資，以及各大洲，國家甚至每個國家內部之間的重定位，日益明顯是用來強化工資奴隸制的.....但是它們也在工薪工作者數量的增長中結束。因為他們裡面的全球生產分工相互關聯，也因為被凍結在這種情況下的每個企業內部的有保障工人和貧窮較不穩定的工人相互關聯，這些工薪工作者越來越屈從于臨時工作。 我們注意到，經濟復蘇時，這是第一個"就業的光環"反應。

利潤：跨國公司繼續其凝集運動，加強他們在有關政府的力量。如果證券交易所指數恢復到其2008年之前的水準，儘管剝削率增加，但投資資本效率（或資本生產率）仍然疲弱，到現在為止利潤似乎並沒有整個恢復，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與此有關的分析是複雜的。因此，利潤不斷指向食利者，利潤分配給股東而不是生產性投資。 我們應該把分析明確落實到每個部門，為了做更精確的研究，這裡以汽車行業為例，因為又汽車業回到了危機前的生產水準，它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結論：當前的經濟危機已經遍佈全球，但各地情況不同。 現在，在其爆發6年多後，我們無法談論全球金融危機的淡出：利潤不穩固，經濟"復蘇"是脆弱的，不穩定因素非常顯著。

資本主義繼續運作，受到其成熟的組織及其巨大靈活性的保護。 但經濟動盪和不平等的增長令人目不暇接，阻礙其合法性得以堅實的恢復，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獲取資訊的方法是空前的，例如，可以展示這樣的事實： "85個最富有的人所擁有的，多達世界一半人口的所有" （樂施會報告，2014年），讓這個說法到處傳播。

2. 動盪和不斷增長的社會-政治危機

2.1 帝國主義內部競爭的動態

儘管美國歐洲仍然是兩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集團，但美國的地位已經削弱，而歐洲則削弱得更甚，首先是利益，但還不止於此，權力轉向亞洲，主要是中國。 因此，為了恢復或獲取地緣政治統治地位，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加劇。

布殊時代的美國新保守主義反攻顯然失敗了。 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已證明是災難性的，而在阿拉伯革命的背景下，奧巴馬採取較為溫和立場的試圖，已不再有說服力。 美國首先關注遠東，關注歐盟，要在某處採取主動的欲望，並不是真的有用。 因此，我們看到，它一方面嘗試與伊朗發展"美式和平"，另一頭，又與以色列...收效甚微！來自維琪解密或斯諾登/國家安全局的事情，使美國政府在世界的信譽受到的影響。 與此同時，奧巴馬的管理力被削弱了，他的國內政策有執行上的困難：預算"停擺"，奧巴馬醫改（Obamacare）受限。 同時，美國仍是最大資本主義強權，它試圖不斷地推進其強處。 因此，在2013年說服歐盟各國政府進入最後的 --- 和秘密的 --- 談判，訂立一個新的跨大西洋市場自由貿易條約（TAFTA），這將把歐洲經濟全面（公共服務和合同，社會，文化，環保等）開放給無節制的競爭，因此給大型私人集團以剝削人民和自然的龐大權利。

在結構上彙聚了新自由主義之資本主義利益的歐盟，在這同一時間，很少體現出政治上的團結。 歐盟的外交政策是不一致的，英國，還特別有法國帝國主義試圖玩弄少數幾個併發性後果：西方干預利比亞後沒有抓緊它； 非洲薩赫勒地區的動亂不斷增長；敘利亞衝突開始讓俄羅斯在中東再擔重任。為了在歐洲以外"突出"自己，奧朗德和卡梅倫試圖恢復其帝國主義的傳統政策，結果削弱了他們的政府，而圍繞

默克爾的聯盟受益於歐洲內部的"中心-週邊"的關係。 最後，某些國家內部離心力的高漲已確定：在西班牙、英國、比利時等。

結構調整政策和帝國主義干涉非洲的模式打亂眾多的國家結構。 目前在一些國家可以看到的經濟增長，只導致了不平等狀況的增加，糧食作物經濟的毀滅和絕望。 中國成了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演員，法國-美國的競爭者； 機會主義的宗教原教旨主義勃發為新的意識形態演員，以及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應（干預馬里和中非共和國），這一切繼續把這個大陸推入戰爭，混亂和人道主義災難。 南蘇丹後，是否會輪到喀麥隆還是其他地方？

在遠東地區，我們有好幾年目睹了帝國主義間緊張關係的高漲，它發生在日本，中國和東盟的保護者美國之間，特別是爭奪對中國海的控制，而且還有朝鮮問題。 在2014年初，還有其他的緊張局勢激化發生在東歐，因為普京拒絕任何削弱俄羅斯掌控其鄰國的新動作，比如烏克蘭。 隨著經濟競爭的惡化，和重新使用從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政治問題衍生出的沙文主義，國家之間對抗程度增加的風險是真實的和增長中的。

2.2.生態災難，環境的商品化和人口的流離失所

在整個世界，氣候變化的後果才剛剛顯現，但首先感受到的是熱帶地區。 我們已經看到目前的破壞（乾旱和洪水），還有可以歸因於這一變化的災害，如突發的暴風雨，這些引出的問題是，當國家和國際機構在這個層面越來越無效的時候（見海地的資產負債表中），如何提高人道主義聲援和重建的水準。 我們對災害之特定反應的發展，從第四國際參與菲律賓颱風的聲援經驗開始，是本次會議特殊貢獻的主題。

面對這些針對人類的危險，資本家扮演了環境危機，尤其是氣候能源危機中禿鷹的角色，開闢新的利潤來源("綠色資本主義"，碳股市，等等）。 無論人們的生態覺悟如何，對環境的威脅仍然是大規模的，而且降低許多領域和地方的生存條件：特別加速赤道區的森林砍伐；海洋和河水的污染以及清新水的攫取； 掠奪性採礦，葉岩氣的醜聞，核電的危險和價格（因而福島災難的後果遠未得到解決）等等。 同時，跨國公司繼續施壓，要徵用土地，農業投入和生存的專利。 所有這些動作是今天徹底鬥爭的引爆器。

最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社會環境和政治危機倍增了武裝衝突和被迫流離失所的人口，兩者都有一個可怕的人道成本。北方國家，首先是歐洲國家，正在變為難以進入的堡壘，它們毫不含糊地把海洋移民和難民推回去，而這同一時間，千百萬人被留在南方國家的臨時營地中。 這些現象都重新出現在非洲或亞洲，現在則圍繞敘利亞衝突。 拋棄難民將成為世界局勢動盪和醜聞增加的源頭。

2.3 針對危機不同方面而爆發的群眾運動

不斷湧現的群眾運動具有經濟，社會，體制和生態等方面。 面對他們的情況惡化以及缺乏未來的青少年，民眾以不同於舊工人運動的更新方式的反抗闡明這些方面，因為舊工人運動不是整合到主流政策裡，就是基本已過時了。

阿拉伯地區的革命過程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獨裁者倒臺後，我們看到群眾運動延續，直到後繼的政府特別是伊斯蘭政府倒臺，穆斯林兄弟會的危機已經達到了土耳其。 群眾起義在一些國家（摩洛哥、約旦等）已經消退，但在其他一些地方（例如蘇丹，甚至沙烏地阿拉伯）繼續出現。 然而，由於敘利亞人民以一個英勇

而可怕的方式經歷了國家機器的反攻，還有宗教法西斯主義潮流在擴大。而社會主義前景的弱點越來越成問題。 吉伯特·阿查（Gilbert Achcar）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工具，理解其過程中的複雜性和其有進有退的長期延續的可能性，並幫助其發展。

城市危機和反腐敗鬥爭所顯現的社會政治爆炸，搖動了一些被認為是統治階級穩定的國家：在2013年年中，我們在同一時間看到，在土耳其出現了保護格茲公園（Gezi park）和塔克西姆廣場（Taksim square）的抗議運動，在巴西出現了一個反對運輸價格和足球世界盃條件的抗議運動。追求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抗爭在許多新興國家醞釀，只待爆炸。

我們也看到，在東亞出現新的特定的無產階級起義，不過政治代表性有時很薄弱或不連貫：孟加拉，柬埔寨等等。有一些新領域尋求激進的替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措施。

在歐洲南部和巴爾幹地區，面臨著生活條件前所未有的退化，社會挫折，起義和群眾運動是結構性的，即使勝利是罕見的，即使沒有擊敗緊縮，即使沒有政治出路，運動還是不斷更新或發展：希臘，葡萄牙，西班牙，保加利亞，現在的波士尼亞 --- 雖然老的工人運動在消亡，但新的社會運動有什麼樣的潛力？ 由此，希臘局勢的命運有一個特殊的重要性。

在前蘇聯， 作為安全服務的特定制度“民主獨裁（democratures）”的反對派，寡頭和腐敗在2012-2013年的俄羅斯得以強烈的展現。2014年初，在烏克蘭圍繞基輔中央廣場“邁丹”發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運動，大規模活動推翻了統治集團。 這是必要的做法：儘管有非常強烈的壓制，有超越西方帝國主義的動作，並有極端的政治混亂，民眾運動仍然在尋求他們的道路！

在拉丁美洲，在多樣性方面，從最反帝者（委內瑞拉），通過仲介形式（阿根廷），到最大程度整合進新自由主義者（巴西），抽取式新發展主義的極限已經達到。有新的群眾運動出現，但反動的右翼也在伺機而動。

儘管他們經常混淆，但因為他們的訴求是正義的，我們支持幾乎所有這些非凡的街頭暴動。 罕見的例外是泰國和委內瑞拉，因為據我們對他們的瞭解，他們自始至終被極端反動的階層所構造。 我們看到，最後，若在中間階段沒有進展結果，群眾運動可以轉化為破壞性的社區暴亂，並且在統治階級動用反革命工具反攻的情況下，多在全球遭到挫敗。

2.4 反革命的推進

隨著經濟危機的尖銳化，反革命傾向在統治階級先前攻勢的基礎上形成：隨著新自由主義固有的社會回歸組織，一方面是政府“反恐戰爭”機器的發展，另一方面是極端反動分子派別的興起，兩者結合起來。

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力量，受到深深震撼，通過國家機器做反應，以捍衛國家利益為名，挑戰民主權利：從美國到中國，都有廣泛的電子監控；新的法律威脅結社和活動的自由；完善殘暴的反示威設施。 最近很多事都證明，沒有大陸不把工作階級的民主文化活動定為刑事罪：在歐洲（西班牙、法國、俄羅斯），亞洲（巴基斯坦、中國），非洲（南非、埃及）和拉丁美洲（阿根廷）。

包括在民主成果最穩定的歐洲，我們看到各級民主權利都在減少：“三駕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反活動分子法律以及法律決定，膨脹的保安和員警機器，包括那些私人設備，都在挑戰議會的作

用；

在世界各地，極端反動的法西斯主義派別越來越有力地干預公眾場所，干預的形式非常不同，有時結合起來，把女權，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和變性戀（LGBTI）的權利犯罪化，挑戰社會公共服務：

• 美國茶黨，法國"全民示威（Manif pour tous）"運動；

• 歐洲的種族民粹主義運動，針對的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黑人，還有更廣義地針對羅姆人；

• 匈牙利的極右民粹主義掌權，或許很快在印度也會有極右民粹主義政權；

•新納粹運動出現在希臘或東歐，有時出現在跨階級的民主反對派裡面；

•所有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到處出擊，威脅受教育的權利，婦女和同性雜性戀者（LGBTI）的權利，藝術表現的權利，並且越來越多地採取謀殺方式；宗教原教旨主義轉移並嘗試粉碎人民解放運動；

• 聖戰者開展武裝行動直至名副其實的軍事衝突，在非洲和亞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區軍事衝突在惡化。

在此背景下，我們應強調指出暴力和反革命的攻擊決心無處不在，婦女各個領域的權利遭到反革命攻擊，並在制度層面受到廣泛的威脅，例如西班牙有關墮胎的權利。

結論：

我們面臨著一些反革命，提出了一些舊的但是更新了的戰術問題：

•可能反對他們的是什麼級別的政治聯盟呢？

•如何處理滲透到憤怒民眾的運動中的法西斯或原教旨主義派別呢？

3. 21 世紀初的長期革命和反革命---我們的任務

我們必須在一個非常矛盾的情況下採取行動，面臨許多兩難問題：（我們有幸能夠辯證地思考！）一方面是在世界水準上工人階級和群眾鬥爭大量增長； 在另一方面，存在筋疲力盡的資本主義危機和顯著的反革命攻勢，其背景是工人運動組織結構的損失和社會主義視角的喪失。 但一個重要的事情是，在很多情況下，同既定權力對抗的恐懼已經斷然地下降了。

起義和革命（在列寧的客觀意義上）是非常強大和確定的，它們創造新的鬥爭形式，但有一個有限的自我組織，而且沒有制定多少權力的替代方案 --- 在獲得或鞏固鬥爭成果方面，他們並不成功。 因此，他們只是部分意義上的"實例"，大的混亂仍在繼續。 要如何推進呢，特別是在覺悟水準上？

資本主義不可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無法獲得穩定的局面。這給更直接的反革命工具提供了空間。 但是，重新部署工人運動及其革命成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困難？

老工人運動的危機在繼續：社會民主黨越來越緊密地整合進資產階級機器（在16個歐洲國家的大聯合政府，法國總統奧朗德等），並整合了大工會聯合會。 社會民主黨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另一種形式，以歷史左派文化"為畫廊"。由老共產黨或新左派聯盟政黨代表的新改良主義，為他們能夠創造的社會民主主義左翼

發展空間而煩惱。他們遇到了制定動態觀點的困難，有時提倡新保護主義的絕路，而且對大國之間的關係往往有“選邊者（campist）”的看法，這導致他們拒絕群眾爭取自由的起義，像敘利亞和烏克蘭人民的起義。也有必要分析民族主義運動漸進起源的演變，面臨著多種形式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這使他們處於決定性方向的挑戰前面。

最後，現在全球正義運動回潮，風起雲湧，企圖克服這些危機，關於這個，我們可以總結些什麼？

革命和反資本主義的左翼尋求脫出邊緣化而出現在新的群眾運動中。它仍然介入社會運動，有時會取得顯著的選舉結果，優於其真正的影響力。但它沒有找到足夠的支撐點，展現一個可信而進步的政治開局和片段。

目前，我們第四國際自己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尋求群眾的自我組織，團結的自我組織以贏得基本的社會和民主訴求；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選邊投機主義（campism），制定反資本主義和生態學的女權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方案，適應動盪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形勢，首先是徵用銀行，把大集團社會主義化，像那些毀壞人類和地球的能源集團，要首先社會主義化。但在這個階段，強烈排斥“政治機器”是不夠的，不能取得顯著的影響力！在組織群眾鬥爭的水準和組織政黨爭取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的勝利之間，我們需要找到橋樑。我們必須密切關注激進或革命左派再集結的新經驗，關注他們的特定情況：在西班牙，在英國，在阿根廷等等。

我們或多或少都有事做，我們量力而行參預許多國家的活動，但也有一些地方，在這個時候尤其可以表達我們當前的責任，像希臘、敘利亞、波斯尼亞、委內瑞拉，我們應該在這些地方反映我們的國際貢獻。

我們的核心問題是，要在被剝削階級之間，在各種形式的反壓迫鬥爭之間找到新的國際關聯。如何重振國際團結和政治鬥爭？因為做不到這一點，社會趨於反革命的四分五裂的傾向就可能占上風！

2014年2月22日

注釋

[1]蜜雪兒·胡森：“論危機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及其長期動盪”，2013年12月。

[2]以撒·約書亞：“從1825年到1929年，再到2008年：第三類危機---歷史源頭”。11月18日，2013年。



寡頭階級對美國經濟民主的致命襲擊(來論)

趙京

自從我2006年底提交雅虎2007年股東大會提案被雅虎雇用律師行排除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不作為no-action以來，我開始直接與SEC打交道，在不少文章中都不斷提及SEC的功能、性質和現狀。例如，在“從挑戰Yahoo的案例看監督超級大公司的可行性”一文中觀察到：“如果我們在政治上有足夠強大的資源，可以直接遊說SEC的主席（從加州選出的國會議員）。不過，我們的原則要求我們盡可能回避政治家，而這一次並沒有同時也挑戰SEC的準備。這次瞭解了整個過程，可以說達到了主要目的，沒有必要與SEC計較。實際上，我的直覺告訴我：在這麼多大公司的股東年會表決中，除了一、兩項公司董事會提案（主要表決新的董事、決定會計公司），大多數的良知提案都來自象我這樣的“微小股東”，美國的企業界和其代理利益團體正在設法改變SEC的較民主的條款，提高提案所需的股份額（目前只是兩千美元），以消除這次Yahoo為排除我的提案所付的“麻煩”。對我們而言，趁SEC還沒有完全被大企業集團控制之前，除了聯繫更多的“經濟公民”（股東）繼續挑戰Yahoo外，還準備對跑到美國股市來上市的中國大公司（如百度等）教育一番。”[1]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略微收斂的美國寡頭階級現在終於按耐不住，開始了對美國經濟制度中自上個世紀大蕭條以來碩果僅存的民主權利發起了致命的襲擊。首先，華爾街日報3月12日報導了四家公司對我的老朋友Chevedden採取法律手段、企圖封殺他的言論自由的消息[2]。而報導中對Chevedden所用的gadfly（牛虻）一詞，正是柏拉圖用於蘇格拉底的稱號[3]，因為自2010年以來，Chevedden提交了157個強烈譴責董事會階級貪婪的提案，其中55個提案獲得了多數股東贊成[4]！接著，華爾街日報3月28日發表了納斯達克Nasdaq OMX Group執行副總裁/總律師/法規總管Knight的意見文章 The SEC's Corporate Proxy Rules Need a Rewrite（SEC的企業投票規則需要改寫），直接對證券交易法中容許“持有1%或兩千美元股份一年以上”的股東提交提案的民主規定開刀。這實際上是配合3月27日SEC五個總統任命的委員之一Daniel M. Gallagher在Tulane大學法學院企業法研究所第26屆年會的演說 Federal Preemption of State Corporate Governance（聯邦政府侵犯州政府的企業管理許可權）[5]。

---

[1] 趙京，2007年4月17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07/yahoo.pdf

[2] Wall Street Journal, “Corporations Take Swats at a Gadfly,” March 12, 2014.

[3] 冷戰期間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人們很熟悉被譯為俄文、中文等文字的美國作家伏尼切契Voynich的小說、電影《牛虻》，但美國公眾一般並不知道她的作品。

[4] 包括我3月4日代為宣讀的提案。見趙京“推動應用材料公司治理的成功戰例”，http://cpri.tripod.com/cpr2014/applied.pdf

[5]

Gallagher 污蔑我們這樣的關心企業社會責任的小股東活動人士“綁架” hijack 了股東提案制度，好像他可以以雅典政治秩序和羅馬帝國的名義處死 gadfly 蘇格拉底和耶穌一樣。確實，2010 年 10 月 15 日，在新聞集團的人權犯罪被暴露之前，這個家族帝國的董事會跟班們（包括西班牙前總統）在股東大會上就是這樣對待我的人權提案的[6]！

Gallagher指責我們對公司的利益不感興趣、甚至與公司的利益作對。如果他也是一個股東，當然有權利這樣認為並投票反對我們的社會提案，但作為SEC委員，他要剝奪我們提出對董事會沒有強制效力的提案（且常常被董事會濫用公司資源雇用律師行編造理由排除）的權利，就不由得令人懷疑他的聯邦政府官員資格了。他進而以hedge fund（對沖套利賭博基金）很少參與提案的事實，說明股東提案不是企業治理的有效方式，這正好說明他代表了套利基金的利益。例如，某套利基金用 5%的股份呼風喚雨，謀得雅虎公司3個董事會的位子、還替換了CEO，但我的獲得32%股東支持的企業社會責任提案卻被董事會置之不理[7]。Gallagher委員還嫌套利基金的權勢不夠大，妄圖把我們的經濟生活推向套利基金的奴役之下！

Gallagher聲稱股東可以到（州）法庭去尋找公正，但我們知道，絕大多數在矽谷的國際大公司都在遙遠的偏好公司的德拉瓦州註冊，我們這樣的小股東根本沒錢雇用律師行去買到公正。實際上，2009年，我在董事會上的人權發言被谷歌秘書長打斷，我投訴SEC，SEC回復說這是公司註冊所在州的法律，而我沒有能力為了這點小事去德拉瓦州法庭申訴，哪有什麼公正可言[8]？

Gallagher乾脆明目張膽地承認：“我不知道我們甚至是否需要股東提案，”“我要建議取消股東提案制度”；並說“管理股東提案花費公司太多成本”，卻完全不提與公司業績無關的逐年高漲的CEO報酬。Gallagher露骨地建議把提案資格股份暴漲一百倍到20萬美元或一千倍到2百萬美元，一勞永逸地排除他所攻擊的“pet projects”。在他的眼中，象聯合國全球契約這樣的企業社會責任也成了“寵物項目”！最後，Gallagher要把證明提案內容清楚、準確的負擔責任推給股東，把裁決提案內容的權力不經法庭交給公司，讓我們看到：他的最終和唯一目的就是hijack綁架SEC，為寡頭階級利益服務。那樣的話，我們只有到公司總部門前抗議一途了。

美國的脆弱的經濟民主在危機中！讓我們行動起來，阻止寡頭階級對美國尚存的民主制度的致命襲擊。

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4月5日]

---

http://www.sec.gov/News/Speech/Detail/Speech/1370541315952#_edn10

[6]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2010proposal4.pdf

[7] 趙京：“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前景展望”，2013年7月23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3/csri-yahoo.pdf

[8] 趙京：“專橫卑鄙的Google(穀歌)2009年股東大會”，2009年5月12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google-c.html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我的抗爭，穀歌2000年接受我的人權提案，並作出積極政策改變。趙京：“以股東提案推動Google穀歌的人權政策轉換”，2010年4月22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gsp.pdf 。

推動應用材料公司治理的成功戰例(來論)

趙京

我在“佔領（惠普）股東大會的藝術”1中指出：“佔領運動的實質就是在決定我們生活的公共空間確保我們的發言權，其中之一就是佔領決定全球化走向的各大公司的股東大會。”今天，我代理Kenneth Steiner前往佔領Applied Materials應用材料公司2股東大會，宣讀第4號公司治理提案時。

我2003年出席過應用材料的股東大會3，正好今天下午又要在三藩市的矽谷人權會議上發表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CPRI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數CSRI 4，其中包括應用材料的指數(C)，就把研究報告也送一分給接待我的公司女士。公司原CEO、現任董事會執行主席Splinter（說起來還是我的校友）宣佈會議開始，我巡視會場，除了十來個董事外，有幾個公司員工，加上十來個股東，總共不足三十人。幾分鐘以後就輪到我宣讀“修改章程讓10%以上股東有權要求特別大會”的提案5。與類似的提案6一樣，我們的目標是動員多數股東站在我們一方（因為這是多數股東不願被董事會反對聲明奪走的權利），同時“順帶”譴責高層報酬貪婪等公司治理上的弊端（我們的股份太微弱，直接這樣提案的正面強攻的戰術都沒有奏效過）。提案的後半部才是要點：獨立研究機構GMI2013年的報告認定公司財務為D等級、高層報酬為F等級（CEO Dickerson 拿走1千5百萬美元），董事會主席不獨立，沒有加入“聯合國全球契約”，在健康和安全管理方面沒有加入OHSAS 18001，等。

因為只有十來個股東7，CEO連一般股東大會必有的公司業績也懶得報告了。整個股東大會，從11點0分開始，到11點11分結束，有近一半的時間圍繞我們的提案進行，達到了佔領股東大會教育資本階級的戰略目標。兩個股東提問股票的走勢後，公司秘書長開始報告4個提案（前3個是董事會選舉等公司提案）的投票結果：我們的提案得到54%股東的贊同！公司不得不低頭，表示要修改章程。下一步，我們要把這個成功的戰例推廣到別的公司治理上。

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3月4日

[1] 2012年3月21-28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2] 其中文网站
http://www.appliedmaterials.com/zh-hans/about/company
公司简介：应用材料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应用材料的创新设备、服务和软件被广泛应用于先进半导体芯片、平板显示器和太阳能光伏产品制造产业。2013财年营收75亿美元，在18个国家设立了84个分支机构，员工人数约13,700人。

[3] http://cpri.tripod.com/cpr2003/stock.pdf

[4]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csri.pdf

[5] http://www.appliedmaterials.com/investor-relations/annual-reports-proxy-materials

[6] 赵京“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NetApp的公司治理提案”http://cpri.tripod.com/cpr2012/netapp.pdf，2012年8月31日；“成功改进MEMC公司治理的战例”，2013年5月30日。

[7] 2003年在硅谷的Santa Clara会议中心举行，有五、六十个股东。我注意到参加股东大会的人数有普遍减少的趋势。

2011-2014：埃及革命三年

諾哈·拉德萬

1月14日和15日，針對新憲法，埃及舉行了公投，這個憲法是在莫爾西總統去年7月3日下臺以後起草的。該憲法將取代此前在2012年頒佈的憲法。

這是一個定局，因為公投顯示了對國防部長和內部安全事務副部長阿卜杜勒 - 法塔赫·塞西將軍的領導信心，這保證了產生廣泛多數的“贊同（Yes）”票。但是，官方公佈的所獲選票是98%，考慮這個結果時必須著眼於38%的投票率。

未來政府的成功，有時取決於憲法，但這不會是埃及的情況。沒有強大的人民組織，憲法可能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

自從莫爾西總統被推翻後，阿卜杜勒 - 法塔赫·塞西將軍作為埃及救星的崛起，可以歸因於一系列複雜的條件和事件，所有這些原因促成了一個政治的反革命和穆巴拉克政權的回歸。

對於一場如此慘敗的革命，要保持希望，可能是很難的，但我認為有希望。我作為2011年埃及革命初期的見證者之一[1]，尤其是在我經常訪問那裡的時候，一直在密切觀察它的跌宕起伏和意外轉折。

在2013年6月的最後一周和7月初，我在那裡，深深地感覺到，2011年的革命仍在持續。議會，總統選舉以及各色的憲法改革之路被迫消散，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之間的衝突僵持無果，導致革命出軌，似乎無人有興趣於任何革命性的變化 — 最終由極權的民族主義霸權話語取而代之，讓整個國家陶醉在塞西將軍的輕聲細語中，除了穆斯林兄弟會（MB）的支持者之外。

前軍事情報頭子塞西，在2011年捍衛了“童貞測試”（由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下令對被捕的示威遊行女子進行的測試 --- 編輯）。現在，他套用他最早的公告之一，把它用在軍隊上，向埃及人提供了革命未能提供的溫柔呵護。

尋找革命

我在十二月返回到一個國家，在那裡，隨著8月14日的拉布大屠殺，對於穆斯林兄弟會（MB）和他們的支持者，死亡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現實。毫不奇怪，儘管只是暗示，大屠殺本身已經成為了下臺總統支持者重新聚結的口號 — 通過任何方式，使用現在已經臭名昭著的圖片，這個圖中的黃色背景上有四個伸出的手指 — 這個口號已被定為要受法律制裁的罪行，而且更頻繁的是，通過一支獵槍的槍管而判罰。（拉布是附近清真寺的名稱，那裡發生了大屠殺。反過來，這座清真寺的名字來源於一個14世紀的女蘇菲神秘主義者。拉布（Rab'a）這個詞也是阿拉伯語“第四”的意思。 ）

然而，最令人吃驚的，是對於這些恐怖之類的事，有相當的公眾感到滿意。然而，去年十二月，只是在國內的短暫停留，就讓我對這種滿意情緒較易理解了，雖然這不可原諒。

自七月以後，恐懼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政府產品。穆斯林兄弟會（MB）涉嫌恐怖主義，對它的恐懼，是許多人的心態，所以對國家恐怖主義他們沒有什麼可說的。埃及官方媒體掌握

了妖魔化穆斯林兄弟會的藝術。在很多人眼中，他們已經成為恐怖分子，不僅是國家的敵人，也是埃及人民自己的敵人。

我12月前往埃及，尋找是主要動機。我去尋找革命希望的跡象，想尋找到最小的跡象能表明，穆斯林兄弟會對政府壓制的蔑視，不是它僅剩的一切。這些跡象微弱，很難找到，但它們存在。

埃及工人在非常惡劣的時代恢復了英勇鬥爭，他們的罷工正在取得相當的勝利。九月份，一個小型陣線 Thuwwar [2]形成，只有150名創辦人（其中28名是女性），但十一月及十二月它在開羅市中心號召了幾次示威，吸引了500-1000名參與者。

該陣線的組成，是一些個人和團體不懈努力的結果，他們中間有一小組核心忠誠者，還有一些團體，如革命社會主義者，4月6日組織，埃及經濟和社會權利中心。還有其他幾個仍然致力於一個文官政府的團體，他們的目標是，這個政府既不由穆斯林兄弟會也不由穆巴拉克舊政權及其軍隊主導。

在擔任總理的右翼經濟學家哈贊姆·貝伯拉威和塞西將軍領導下的後七月（post-July）政府，採取極度反動和高壓的措施，做得不好。未能顯示任何鬆動穆巴拉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日益加大的員警鎮壓水準的意願，讓大多數埃及人感到苦澀的回味。

群眾正在痛苦地看到， 無論是現在的政府，還是在未來幾個月的議會和總統選舉後產生的政府，都不會改善他們的狀況。可以確定，造成2011年起義的客觀條件仍然存在。

產生埃及“革命局勢”的條件和不滿，在今天仍然同三年前一樣，但正如列寧所寫的，單單是一個革命局勢，遠遠不足以引起一場革命，還必須伴有革命階級採取強大行動的能力，其行動要足以動搖舊政府。仍然不明朗的是，那樣的“革命群眾行動”什麼時候會出現。

第一階段

在軍政府或其主導下，革命性的變化不可能出現。以新自由主義宗教為基礎的組織也不能帶來革命變化，因為它甚至不回避國家機器的老套的鎮壓措施。對一些人來說，這些事實可能已清楚，可是埃及人似乎是被迫艱辛地懂得了這些。

2011年1月，在員警和示威者之間的激烈和血腥的鬥爭之後，埃及軍隊部署到街頭，導致了員警的失敗，使員警從街頭完全消失，這個行動所帶來的歡呼，在革命的最初幾個月一直持續著。“人民和軍隊手牽手。”

2月11日，那些歡呼情感變得更加狂熱，當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的發言人宣佈，穆巴拉克總統辭職，最高委員會接管政府。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宣佈，其治理將是一個過渡階段，在此期間，它將監督憲法修改，議會和總統選舉。一個民族慶祝並宣佈了革命的勝利，而且世界各地的問候紛至遝來。少數人對軍隊和人民的這個聯盟持懷疑態度，就是這為數不多的人，不到一個月後，又回到解放廣場（Tahrir）恢復靜坐。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很快露出了牙齒，並在員警繼續缺陣的情況下，對示威者作了大規模鎮壓。

示威者的訴求集中於提高透明度，對革命目標即社會正義有更明確的承諾，以及真正地清除穆巴拉克政權，起訴被廢黜的總統，起訴他的政府高級官員和埃及商界精英，後者通過

賄賂穆巴拉克政府而使財富的積累得以擴張。

現在很清楚，沒有作什麼迎合這些要求的事情，所做的多為平息抗議活動，但並沒有讓革命更接近其目標。例如，雖然穆巴拉克，他的兒子和幾個他們的親信被逮捕，並指控他們貪污及酷刑甚至殺害2011年1月的示威者，但這些指控中最嚴重的罪行，在庭審時已經去掉了。

這裡要注意的是，雖然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的馬歇爾·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在2011年上半年獲得讚賞，因為他"站在革命一邊，拒絕攻擊示威者，" 但在穆巴拉克的審判中，他的證詞顯然未涉及攻擊示威者的總統令。 埃及媒體避而不談這個矛盾。

2013年夏天，穆巴拉克和其曾是商界大亨的兒子，還有國家民主黨政策委員會的前負責人艾哈邁德·伊茲（Ahmad Ezz）及其他人，從監獄被釋放。 而穆巴拉克的內政部長哈比卜-阿茲利被判終身監禁，罪名是對示威者使用暴力，時間已經表明，埃及警方並沒有多麼改變其政策和程式。 此外，同2011年3月，7月，10月及11月員警一再所作的事情相比，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所實行的殺戮並不更少。

兄弟會和軍事當局

可笑的是，針對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持續抗議活動的最具體收益，竟是迅速完成向當選總統轉移政府的計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穆斯林兄弟會幾乎消失於街頭抗議活動時，在一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同謀和秘密交易的聲音中，該組織終於成了最大贏家，2012年6月穆罕默德·莫爾西當選為總統。

2011年1月及2月走到一起推翻穆巴拉克的聯盟具有廣泛的基礎，在他們當中缺乏結構化的組織，這兩個特點有助於產生這種壯觀的起義，也是這些革命者在選舉中失敗的原因之一。

莫爾西掌權一年，這一年很快就表明，他更熱衷於討好穆巴拉克的"根基深厚的政商人脈"，而不是加強穆斯林兄弟會和反抗前政權的其他力量之間的聯繫。 特赦穆巴拉克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前負責人坦塔維，晉升一名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成員及軍事情報頭子為國防部長，以及在2013年1月25日革命二周年紀念日，莫爾西低三下四地演講，稱讚埃及警方，只是這種興趣最明顯的跡象。

莫爾西總統也充分表明了完全的意願，不退出過去四十年建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他的政府宣佈，計畫繼續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借貸，把政府企業私有化，並通過稅收減免和投資優惠的法規招引外國資本投資。不用說，這樣的計畫與設定最低和最高工資，加強工會，甚至調整稅收結構的任何願望是衝突的。 沒有對這些願望承諾的明確跡象，其理由是，首先"需要使國家重新站起來，"重點是穩定和恢復更高水準的國民生產總值，因為自2011年以來國民生產總值一直下降。

莫爾西掌權一年的特點應該是來自大眾的壓力，人民要求他的政府追求革命的理想，與穆巴拉克政權和它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決裂，並起訴那些壓迫和掠奪國家三十年的人，但是相反，少數發出這樣要求的人，被淹沒在媒體策劃的運動中，這個運動以最仇視伊斯蘭教的說法醜化兄弟會和他們總統。

穆斯林兄弟會和它的支持者被妖魔化為"伊斯蘭主義"，其目標不僅是接管國家，而是

接管整個地區。 埃及的世俗化，多樣性，多元文化和現代性中的傲慢的大男子主義話語，以及由於兄弟會的掌權而讓所有這些重要特點引起的危害，主導了國家的"獨立"媒體，主要是電視。

這裡應該指出的是，即使是粗略地看一下這個媒體的所有權就會發現，他們不是獨立的，而且永遠不會為人民革命服務。其中一個最大和收視最廣的電視頻道，是反莫爾西運動的先鋒，是納吉布·索維利斯（據福布斯說法，淨資產為27億美元）所有的全國最大電信公司。前軍官蘇萊曼·阿米爾，在穆巴拉克時代運用腐敗手段獲取低於市場價的保障土地，建築豪華住宅度假村，大發橫財，他擁有另一個收視者眾多的電視頻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頻道的名稱為 "解放廣場（Tahrir.）"。

大多數人對持續的經濟危機感到沮喪，而莫爾西政府內部確實缺乏政治遠見和能力，埃及媒體利用這個形勢，在短視和機會主義糾結一起的反莫爾西政府的領導人的幫助下，把革命引入了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主義之間的愚蠢衝突裡。

莫爾西的反對派納入了罕丁·薩巴希（Hamdeen Sabbahi）和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med al-Baradei）之間的聯盟，薩巴希是一個公開的納賽爾主義者，主張國家控制經濟，而巴拉迪是堅定的自由派，其黨綱主張市場和西式民主。

該聯盟成為一個陣線的核心，這個陣線是一個知名人士的大雜燴，包括一些像穆薩那樣的人，穆薩曾在穆巴拉克政權任職。 當然，"可憐的陣線，"薩邁·赫納吉布在革命社會主義黨季刊 "參與雜誌"（Awraq Ishtirakiyya ，23期，2013年6月）的社論上是這樣稱呼它的，只能闡明一個反對莫爾西政府的委屈：他們是伊斯蘭主義者，對我們世俗主義的一個威脅。

"陣線說明把衝突轉換成身份標識，一個是由陣線代表的民間潮流，一個是兄弟會及其在薩拉菲斯特分子（Salafists）中的盟友所代表的伊斯蘭陣線，" 納吉布寫道。

如果世俗話語與伊斯蘭話語的對抗習以為常而不明顯的話，那麼，接著莫爾西總統的下臺，"世俗主義者"自己與埃及最保守的團體，薩拉菲斯特分子（Salafists）結盟，薩拉菲斯特分子就像丟棄一個燙手的山芋一樣，拋棄它與穆斯林兄弟先前的聯盟，"世俗主義者"還與該地區最殘酷的政權沙特結盟。

"然後，自由主義者送給了兄弟會另一個免費大禮，就是與穆巴拉克政權的殘餘聯盟並且不斷地要求軍事干預，" 納吉布繼續說，這個要求，遭到了革命社會主義者的斷然拒絕。

納吉布分析了6月30日群眾抗議活動所透露出的難題：所有穆斯林兄弟會的對手都參加了這些抗議活動，但這些勢力各有其性質不同的目標。穆巴拉克舊政權的支持者在那裡同自由派資產階級反對派站在一起，只是想更換穆斯林兄弟會，而不想繼續革命。

革命者也會到場出現，納吉布又說，但對於他們，結束兄弟會的統治是不夠的。更有甚者，他們的目標是追隨2011年的革命，起訴軍隊，員警和商界精英中穆巴拉克的人，並用直接代表埃及工人，農民和窮人的另一種政府取代目前的政府，響應人民對尊嚴和社會正義的要求。

"反恐戰爭" 復活

要求軍事干預的呼聲，通過反對穆斯林兄弟會的群眾狂熱，壓倒對手，而這種干預的獲

益者，無非是舊政權的代表們，現在這既不是秘密，甚至也不是新聞。

大部分那些以革命的名義反對穆斯林兄弟會的人，現在詭異地沉默。埃及內政部又回到了2011年以前的全盛狀態。 大規模逮捕，街頭槍擊，酷刑和非法拘禁，現在是家常便飯，所有這些都是以布希式的"反恐戰爭"名義進行的。

埃及人今天正在重複許多美國人在2001年所犯的同樣錯誤，放棄公民自由和批判性思維，希望獲得空前難以捉摸的安全。塞西將軍主持下落實到位的偽公民政府，已獲得大多數埃及民眾的滿意，因為它對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進行了政治追究，並屠殺其支持者，它所用的理由是陳年老調：要麼支持我們，否則就是恐怖分子。

甚至顯然未與穆斯林兄弟會結盟的活動分子，僅在去年還是公眾英雄，今天就已面臨壓制，儘管不像"伊斯蘭主義"那麼嚴重，很少或沒有公眾的憤怒。 阿拉·阿卜杜勒 - 法塔赫，一個活動分子和博客，在莫爾西當權的一年裡被監禁，在11月底，從他家被非法逮捕後，一直被警方拘留。

十二月份，三名活動分子，艾哈邁德·杜馬（Ahmad Douma，也是在莫爾西掌權時被囚禁的），艾哈邁德·馬希爾（Ahmad Maher）和穆罕默德·阿德爾（Mohammed Adel，4月6日運動的領袖），被捏造的襲警罪名判以三年徒刑。數百人被逮捕，關押，騷擾和釋放，這些行動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記錄。

12月18日，警方突擊搜查了埃及經濟和社會權利中心（ECESR），逮捕所有在場的人，戴上手銬，蒙上眼睛，把他們帶到一個警察局，在那裡他們被騷擾了幾個小時，才將他們釋放。有關類似恐嚇行為的報導罄竹難書。

埃及工人的鬥爭

在埃及的革命鬥爭中，一個重要的革命活動是工人運動，它一直是功用卓著的，而且今天它仍然是活躍的。 毫不奇怪，關於這個運動的報告稀少，並受到埃及媒體的抹黑，而西方媒體則完全不談它，它們似乎熱衷於把埃及鬥爭描敘為反對政府的腐敗及鎮壓和追求西方式民主的反叛。

這種描敘是歪曲的，儘管主導一切抗議行動的最基本口號是："麵包，自由和社會正義"，但其重點是窮人的基本需求和財富資源較為公平的分配。

馬哈拉是紡織工業最大的中心之一，擁有的員工超過20,000人，必須承認，2008年工人在馬哈拉的罷工，是2011年事件發生的前兆。罷工者的要求顯示了引人矚目的發展，越過他們自己的具體問題，為所有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工人爭取1200埃鎊的最低工資的要求。

從那時起，這個要求仍然在所有工人運動的議事日程上，不過幾個月前，政府不得不作部分的回應（因為它的立場，對於公共部門的工人，那是理所當然的，但對私營部門工人則不是這樣）。

馬哈拉工人的罷工，對同年4月6日總罷工的呼籲而言是關鍵的，這個總罷工獲得部分的成功。總罷工是4月6日組織（the organization 6th April）的跳板，有超過70,000名會員，對所有的抗議活動都有作用。

據埃及經濟和社會權利中心（ECESR）的統計，工人的抗議行動，在2009年是447次，2008

益者，無非是舊政權的代表們，現在這既不是秘密，甚至也不是新聞。

大部分那些以革命的名義反對穆斯林兄弟會的人，現在詭異地沉默。埃及內政部又回到了2011年以前的全盛狀態。 大規模逮捕，街頭槍擊，酷刑和非法拘禁，現在是家常便飯，所有這些都是以布希式的"反恐戰爭"名義進行的。

埃及人今天正在重複許多美國人在2001年所犯的同樣錯誤，放棄公民自由和批判性思維，希望獲得空前難以捉摸的安全。塞西將軍主持下落實到位的偽公民政府，已獲得大多數埃及民眾的滿意，因為它對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進行了政治追究，並屠殺其支持者，它所用的理由是陳年老調：要麼支持我們，否則就是恐怖分子。

甚至顯然未與穆斯林兄弟會結盟的活動分子，僅在去年還是公眾英雄，今天就已面臨壓制，儘管不像"伊斯蘭主義"那麼嚴重，很少或沒有公眾的憤怒。 阿拉·阿卜杜勒 - 法塔赫，一個活動分子和博客，在莫爾西當權的一年裡被監禁，在11月底，從他家被非法逮捕後，一直被警方拘留。

十二月份，三名活動分子，艾哈邁德·杜馬（Ahmad Douma，也是在莫爾西掌權時被囚禁的），艾哈邁德·馬希爾（Ahmad Maher）和穆罕默德·阿德爾（Mohammed Adel，4月6日運動的領袖），被捏造的襲警罪名判以三年徒刑。數百人被逮捕，關押，騷擾和釋放，這些行動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記錄。

12月18日，警方突擊搜查了埃及經濟和社會權利中心（ECESR），逮捕所有在場的人，戴上手銬，蒙上眼睛，把他們帶到一個警察局，在那裡他們被騷擾了幾個小時，才將他們釋放。有關類似恐嚇行為的報導罄竹難書。

埃及工人的鬥爭

在埃及的革命鬥爭中，一個重要的革命活動是工人運動，它一直是功用卓著的，而且今天它仍然是活躍的。 毫不奇怪，關於這個運動的報告稀少，並受到埃及媒體的抹黑，而西方媒體則完全不談它，它們似乎熱衷於把埃及鬥爭描敘為反對政府的腐敗及鎮壓和追求西方式民主的反叛。

這種描敘是歪曲的，儘管主導一切抗議行動的最基本口號是："麵包，自由和社會正義"，但其重點是窮人的基本需求和財富資源較為公平的分配。

馬哈拉是紡織工業最大的中心之一，擁有的員工超過20,000人，必須承認，2008年工人在馬哈拉的罷工，是2011年事件發生的前兆。罷工者的要求顯示了引人矚目的發展，越過他們自己的具體問題，為所有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工人爭取1200埃鎊的最低工資的要求。

從那時起，這個要求仍然在所有工人運動的議事日程上，不過幾個月前，政府不得不作部分的回應（因為它的立場，對於公共部門的工人，那是理所當然的，但對私營部門工人則不是這樣）。

馬哈拉工人的罷工，對同年4月6日總罷工的呼籲而言是關鍵的，這個總罷工獲得部分的成功。總罷工是4月6日組織（the organization 6th April）的跳板，有超過70,000名會員，對所有的抗議活動都有作用。

據埃及經濟和社會權利中心（ECESR）的統計，工人的抗議行動，在2009年是447次，2008

年是487次，2010年是530次。許多這些行動都表明，在他們的要求中，有同樣的發展，具有2008年馬哈拉罷工的特點，要求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起訴並變換腐敗的管理層，還有爭取增加工資的典型要求。 他們中間一些人是非體力（白領工作者 - 編者）的勞動者，這是運動的另一個重要發展。

一個經常被忽略的事實是，馬哈拉的工人連同那些在赫勒萬鋼鐵工業中的工人（12,000工人），以及在蘇伊士，亞歷山大和開羅的其他人，呼籲舉行一個開放式的大罷工，不到24小時後，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即辭職。2011年政府的變換，只是暫時讓工人抗議運動減緩，到三月份，抗議行動又變多了。

據埃及經濟和社會權利中心（ECESR）的說法，在2011-2013年，儘管有主流媒體的抹黑運動，指責抗議者不愛國，只關注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為民族的幸福，但是工人抗議活動的總人數比以往十年都高，。

事實上，工人的要求不斷地越過更高的工資或更好的工作條件。 他們要求變換管理層，特別是在公共部門，那裡在穆巴拉克的統治期，刻意忽視公共企業的管理不善和腐敗情況，因為這樣，然後就有理由，可以把公共企業以低廉的價格出售給私人投資者。

在一個亞麻紡織工廠的工人的長期鬥爭，最近迫使一個法院發出命令，讓這些私有化的努力之一遭到逆轉，那個工廠曾落在沙特投資者的手中。

一些樂觀的理由

後7月3日政府獲得的一個教訓 --- 莫爾西沒有把握住這個教訓---是必須安撫工人運動。（我個人的印象是，總統莫爾西可能把工人和窮人混為一談了，他認為並不需要安撫前者，因為考慮到穆斯林兄弟會的基礎是後者）。

因此，新政府的第一個，也是最令人吃驚的決定，是給勞工活動分子卡邁勒·阿布瑛太提供在內閣一個的位子，卡邁勒·阿布瑛太是2010年成立的第一個獨立工會聯盟的前主席，一個多年鼓動反對舊政權的人[3] 。

第二個決定是，滿足國營企業工人最低工資標準為1200埃鎊的要求。 然而，讓政府大為驚訝的是，工人的鬥爭仍在繼續，他們的抗議聚會看起來此起彼伏。 8月12日，一輛軍隊坦克與其他安全部隊出現在蘇伊士鋼鐵工人靜坐處，強行終止罷工並逮捕其領導人[4]。

幾個較小的罷工和工人抗議活動接踵而至， 11月鋼鐵工人再次拿起了指揮棒。 這一次，工會領導人採取了新的策略：不是罷工，而是呼籲佔領管理總部，並要求不僅把工資和工作條件聯繫起來，而且也包含全面調整企業的管理政策。

他們解釋說，這個鋼鐵廠在該國是獨一無二的，代表了國家戰略產業之一。它孕育於20世紀60年代，作為一個聯合企業的一部分，它也生產其業務所需的焦煤。然而，在穆巴拉克政府期間，允許焦炭工廠出口其產品，使鋼鐵廠只能夠運行其四座高爐中的一座。這導致了工廠工人的減少，從原來的25000變為當前的12000人。

雖然工人的抗議活動，開始於要求支付2013年扣留的全年獎金，但這個要求迅速升級，要求變換管理層，要求政府承諾讓工廠滿負荷運行。靜坐23天之後，經過多重談判，說服工人妥協並接受部分解決方案後，政府同意了工人的所有要求。

鋼鐵工人的鬥爭使阿布瑛太出了名，勞工領袖轉變為部長，也不幸的表明，政府成功地收編了他，加固他對其政策的效忠。但是，籠絡領導者並不等於收納一個運動。

鋼鐵工人的勝利是相當有意義的。它不會帶來政權的改變或革命的成功。然而，這是許多跡象中的一個，表明埃及的革命形勢將繼續，該國無產階級的意識已經成長。

另一個必須提到的重要工人運動是，諾巴斯德（Noubaseed）公司的工人運動。這個公司成立於1976年，是一家生產種子和肥料的國營企業，生產60%用於埃及農業的種子。 它在1988年被出售給沙特的投資者，但在2011年1月革命之後，調查報告連帶非法交易，包括投資者非法收購土地的證據，都提交給了埃及司法部門。

投資者"阿卜杜拉·卡吉"反過來決定關閉該公司，撤銷其銀行帳戶，並且把案件提交到國際法庭。 穆巴拉克的法律把反對工人和國家的權力給了外國投資者。 對此，公司的工人接管了整個生產過程，在農業部專家和所在地諾巴厘亞（Noubariyyah）地區人民的說明下，經營得相當成功。

兩年後的這幾天，目前政府正朝著與沙特投資者和解的方向行進，行將達成一個放棄起訴，歸還公司給他的協議。工人們正在抗議，要求恢復諾巴斯德（Noubaseed）到原始狀態，即國營企業狀態。諾巴斯德（Noubaseed）故事是工人覺悟升起的另一種證明。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埃及工人的抗議活動者中，有一個持續的醫務人員抗議活動，為首的是一個組織，叫"無國界醫生"，它為政府雇傭的醫務人員要求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工作條件。這個覺悟，即普通專業人士和傳統工人階級之間的結合，在當今革命希望非常慘澹的景況中，代表了一個亮點。

毫無疑問，一旦塵埃落定和全民對輕聲細語的將軍的迷戀消退後，一切就會變得清晰，埃及的革命形勢並沒有改變，其革命階級的覺悟已經成長，統治階級將不能夠再走老路。但是再一次，正如列寧提醒我們的：

"並不是每一個革命形勢都會引發一場革命；使革命產生的唯一局勢是，上述客觀變化都伴隨著一個主觀的變化，即革命階級採取大規模革命行動的能力要足夠強大，對於一個即使在危機時期也從未 '跨台' 的舊政府，這種能力如果不推翻的它的話，起碼也要強大到足以打破（或動搖）它。"

顯然，大多數埃及人一直試圖推翻舊政權至今已有三年。他們是否會在可預見的未來取得成功，這還有待觀察。

首次出版於 '中流砥柱' 雜誌，169期，2014年3月/4月。

註腳:

[1]見下文：埃及婦女如何在兩個"黑色星期三"之間回到了街頭：第一手資料。

[2]見Facebook here。

[3] http://egyptelections.carnegieendow...

[4] http://menasolidaritynetwork.com/20...

銀行投機原材料和食品

埃里克·杜桑

銀行通過其交易活動，在場外交易（OTC）市場，進而在原材料和農產品期貨市場變成主要的炒家，因為在該領域裡他們有比其他玩家大得多的金融手段。

銀行通過他們的交易活動，投機於原材料和食品庫，於是在場外交易（OTC）市場，進而在原材料和農產品期貨市場變成主要的炒家，因為在該領域裡他們有比其他玩家大得多的金融手段。

快速流覽一下商品業獎項[1]網站，就會看到，在商品市場（原材料在這裡進行實際的購買，出售和投機）和商品的衍生產品市場上扮演主角的銀行及經紀公司的名單。 其中最經常提到的是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瑞士信貸（Crédit Suisse），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和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 有些銀行甚至走得更遠，它們開發一些手段，使他們能夠直接影響原材料的庫存。瑞士信貸（Crédit Suisse）與最大的原材料買賣國際經紀公司嘉能可-斯特拉塔公司（Glencore-Xstrata）的合作 [2]，就是一個例子。

在歐洲的銀行中，法國巴黎銀行以及德意志銀行是在商品市場最具影響力的銀行，在原材料衍生物這一領域起著關鍵作用[3]。 在2013年，法國巴黎銀行製作和銷售了一種含有不同信用的新結構性產品 [4]，交易者可以用它來購買石油，礦產及農產品。 發行這些債券形式的證券有兩個目的：第一，從銀行帳戶中剔除它們（因為它們的風險大）； 其次，銷售這些結構性產品以賺錢。在市場推出這種新產品之前，法國巴黎銀行獲得了惠譽國際評級機構（FITCH AGENCY）的一個三A評級，給予這種潛在的高風險產品中的等級較高者[5]。其他的大銀行都密切關注其結果，如果法國巴黎銀行成功贏得了養老基金和其他機構投資者對它的商品證券的支援，那麼他們就期望創造自己的這類產品。

幾家美國銀行採取策略，讓其進一步控制商品市場的份額；它們是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高盛。 例如，在2013年頭四個月，摩根大通進口了3千1百萬桶原油到美國！ 美國銀行擁有煉油廠，發電廠，電網，企業備貨金屬，農產品，葉岩氣開採企業，等等。 這是怎麼來的？ 2003年，美聯儲授權全能銀行花旗集團（Citigroup）購買菲布羅貿易公司（Phibro），理由是：原材料（石油，穀物，天然氣，礦產等）的存儲能力是銀行在商品衍生產品市場補充其業務的正常活動。 至於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直到2008年[6]乃具有投資銀行的地位， 根據1999年之後的銀行業改革法，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 Steagall Act）被廢除，他們能夠買電站，油輪和其他基礎設施。

這就是摩根士丹利擁有自己的駁船，油船，管道，石油和天然氣碼頭的緣故！ 在摩根大通這方面，它在2010年以17億美元買下了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商品部門，使他們獲得在英國和美國的74個金屬儲存倉庫，而高盛持有112個。因此，這兩家銀行一共持有的金屬儲存倉庫，比擁有179個倉庫的嘉能可公司（Glencore）還多。一個公司或公司的合作方（例如銀行）想要投機，囤積居奇，以迫使價格上漲，或通過拋售拉低價格，那麼存儲容量是至關重要的。2008

年以來的鋁市場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據紐約時報進行的一項調查，2010年以來，當時高盛收購了底特律的鋁倉庫，鋁棒發貨時間從6個星期至16個月。儘管在全球市場上鋁庫存量是增加的，但鋁價格卻急劇上升。因此，消耗大量鋁的易開罐製造公司出現了強烈反應，比如可口可樂公司和米勒啤酒製造公司。單是在底特律儲存的鋁，已讓高盛積累了2.2億美元的收入[7]

由於操縱股價的利潤豐厚，在實際的商品市場中最活躍的銀行已採取退出戰略；這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監管部門已經警覺到了幾家銀行所實行的操作。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德意志銀行都在幾件事上被罰款了，其中包括操縱美國加州的電力市場。對於這個審理中的案件，摩根大通已同意支付罰款4.1億美元[8]。

在同銀行有競爭的企業的壓力下，以及面臨民眾對整個銀行業的不滿情緒，美國當局正認真考慮遏制銀行在實際商品市場上的業務。其次，2011年- 2012年，銀行的這種市場利潤已經開始下降，市場價格正在縮水。第三，投資貿易公司需要的核心資本 (Tier 1 capital一級資本)大於其他類型的投資（如主權債務）。因此，銀行不得不增加其資本/加權資產（equity/weighted assets）的比率，他們估計，他們最好撤出所有或部分在實際商品市場的投資[9]。要關注這個形勢的進一步發展。然而，銀行將會維持在商品的衍生產品市場的高度活動，在同原材料有關的金融市場的各個領域裡，也要維持高度的活動。除非採取徹底的措施，否則他們仍將可以造成相當大損害。

對於商品市場中長出來的投機泡沫的發展，這些銀行是主要的鼓動者。當它最終破裂時，後果將波及銀行，這又意味著進一步的損害。對於出口原材料的南方各國人民，則是更為嚴重的災難性後果。所有這個星球上的人都會這樣或那樣地受到影響。

投機活動對於2007-2008年糧食和石油價格高漲的基本作用

在美國主要交易所，進行了商品（農產品和原料）的全球價格談判，對於2007-2008年糧食價格的上漲，在美國主要交易所的投機活動起了主要作用[10]。此價格暴漲，使營養不良的世界劇烈增加了1.4億受苦人，總人數達到10億（每七人中有一人）。在這個投機活動中的主角們不是孤立的太保，而是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11]，養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險公司，商業銀行和大型經紀公司，如嘉吉公司（Cargill）。在較小的程度上，對沖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12]也參與其中。

麥可・W・馬斯特（Michael W. Masters），管理了華爾街對沖基金12年，2008年5月20日在華盛頓，他在一個國會委員會研究這個問題的會議上，證明了機構投資者對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有害影響[13]。他聲稱：“你要問的問題‘機構投資者是否促使了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我毫不含糊的回答是‘不錯’”。在他的權威的證詞裡，他解釋說，食品和能源價格的上漲，並非由於供應不足，而是因為在商品的“期貨”市場裡，來自新玩家的需求突然增加。在期貨市場，投資者購買未來的生產：三年或六年一期的下一次的小麥收穫或石油生產。從理論上講，這些市場的主要投資者都是公司，它們希望營運企業所必不可少的商品得到保證的供應，例如航空公司，為保證他們未來的燃料供應，或農工業企業購買特定的穀物。馬斯特表明，在美國，機構投資者分配給期貨市場上的大宗商品指數交易資產，從2003年底的130億美元上升為2008年3月的260億美元。在這些市場上市的25個基本商品的價格，在同一時期

上漲了183%。 他解釋說，大宗商品市場是一個狹窄的市場。 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只需要用其資產的2%就會淹沒系統。 2004年，該市場合約的總價值為1800億美元，而在世界範圍內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總價值為44萬億美元，約240倍多。 馬斯特表示，在這一年，機構投資者投資了250億在期貨市場，占該市場的14%。 他表示，在2008年的頭三個月，機構投資者大大增加在這一市場的投資：在52個工作日內投入550億美元。現在有一種製造泡沫的方式。

商品期貨市場上的價格對這些商品的目前價格有直接影響。因此，在2007和2008年之間，當機構投資者購買大批量的玉米和小麥時，價格立刻暴漲。

2008年，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裁定，機構投資者不能被認為是投機者：而是合法的商業市場參與者。這使得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申明，投機活動不影響商品市場的價格。 麥可・W・馬斯特嚴厲批評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但不如邁克爾·格林伯格的批評力度，邁克爾·格林伯格是馬里蘭大學的法律講師，在1997至1999年期間是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部門總監，在2008年6月3日舉行的一個參議院委員會上，格林伯格批評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董事們，眼看著機構投資者操縱著能源價格，他們無所作為，把頭埋在沙子裡，並引用了一些他們的說法，這些說法值得載入人類的虛偽和愚蠢的文集。據邁克爾·格林伯格，80%至90%的美國股市的能源交易是投機性的[14]。 他的專業鑒定是不容置疑的。

2008年9月22日，在美國金融危機的陣痛中，布希總統宣佈7000億美元（更不用提已經起作用的大量流動資金）的救助方案，因為投機，大豆的價格上漲 61.5%！

雅克·活脫也表明，在全世界的農產品價格上漲中，投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5]。 他給出比利時銀行KBC的例子，它發起一個廣告戰，旨在向儲戶推銷一個新的商業產品，名為“KBC-生命MI安全的糧食價格 3”（KBC-Life MI Security Food Prices 3），它建議投資在六個農業原料上。KBC的廣告主軸是：“利用食品類商品價格上漲的優勢！” 行銷言語展現的是“缺乏水和農田”成了“機遇”，因為現在是“食品短缺導致食品類商品的價格上漲”[16]。

依據美國司法系統，投機者是合法的。 保羅·約利奧在法國世界報發表的社論，呼籲檢查華盛頓法庭2012年9月29日取消CFTC措施的裁決，因為該措施“旨在解決商品期貨市場上一個交易者可以有的最高限額持倉量，以確保單獨的交易者無法動搖市場”[17]。

前聯合國食物權特別報告員讓·齊格勒毫不諱言他的話：“金融匪幫（banksterism）造成的2007-2008年金融危機，有兩個顯著的後果。首先，在2008年之後，對沖基金和各大銀行重新調整他們的活動，去掉了金融市場的某些部分，轉向商品市場，特別是農產品。 如果我們考察三個主要的糧食作物（玉米，水稻和小麥），它們占到世界糧食消費量的75%，就會發現其價格飛漲。 在18個月內，玉米價格上漲了93%，每噸大米的價格已經從105美元上升到1010美元，一噸小麥制麵粉的價格，自2010年9月來增加了一倍，達到271歐元。 此價格爆炸讓投機者獲得天價的利潤，但傷害了棚戶區數十萬婦女，男人和兒童。 第二個後果是對沖基金和其他投機者在南半球搶購耕地。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11年僅在非洲，就有 4千1百萬公頃（超過1億1百萬英畝）耕地被投資基金和跨國

公司接管。 其結果是小規模農戶被驅逐。”[18]

2013年2月，在一份名為“銀行改革：法國銀行的饑荒投機”（ Réforme bancaire : ces banques françaises qui spéculent sur la faim），非政府組織法國樂施會表示，在2012年11月，四大法國銀行 --- 法國巴黎銀行，法國興業銀行，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和那提西銀行（BPCE）--- 為他們的客戶管理了至少18款投機在商品市場的基金。“有兩種投機的方法”，法國樂施會糧食安全的負責人克拉拉·加馬解釋說，“對農業商品衍生品市場持倉。 或根據這些指數型基金，監控農產品價格並把它推高”[19]。 這些資金的大部分創建於2008年糧食危機開始的時候，目的明確，是要投機食品和其他商品而獲利。

同樣，2013年在布魯塞爾的另類融資網（Réseau financement alternatif）譴責六家在比利時的銀行在全世界參與利用饑荒進行投機的活動。 約有屬於比利時銀行客戶的9.5億歐元被用來投機糧食商品[20]

另類建議[21]

為了制止這種狀況，以下22條是對付糧食危機的另一類建議：

- 禁止炒賣食物；
- 對人們的生活必需品作投機活動是一種犯罪行為，因為這個原因，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必須停止對農產品的投機性投資;
- 禁止商品的衍生產品;
- 禁止銀行和其他私營金融公司“參與”大宗商品市場活動；
- 把銀行社會化，並置於公民的控制之下，讓銀行為糧食主權融資，給予小型公司，合作社和公共農業部門以優先服務；
- 建立或重建國際組織，以規範市場和主要出口產品（即生產咖啡，可哥豆，香蕉，茶葉等的國家聯盟）的生產，使國際水準的物價保證穩定；
- 終止迫使各國放棄自己糧食主權的結構調整方案（SAP）；
- 杜絕土地掠奪；
- 進行全球性的土地改革（為農田，也為水和種子），以確保為當地居民生產糧食的農民獲得資源，而不是有利於為出口目的而生產的大型企業；
- 建立糧食主權的國際法律框架，保護並正式承認每一個國家有權制定自己的政策，保護本國農業而不損害其他國家（特別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公約）；
- 終止外部或內部的公共債務機制所造成的剝削奴役，因為這些債務主要來自私人銀行，杜絕小股東對私人貸款者的奴隸般的屈服；
- 暫停工業化生物燃料生產和禁止轉基因生物；
- 改革歐盟農業政策和美國農業法案，因為這兩者對農產品市場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 不簽收，如有需要，可以終止與糧食主權發生衝突的多邊（WTO）或雙邊（(ALE et APE）的自由貿易協定；
- 建立或重建農產品進口限制；
- 恢復每一個國家的公眾糧食儲備；
- 重新建立保證食品物價穩定的機制；
- 為了穩定農產品價格，制定生產控制政策；
- 控制中間商的利潤空間。
- 糧食安全始於食品價格穩定，這個價格涵蓋了生產成本，並確保生產者有公平的收入。 低廉價格的模型，是西方政府推進的，目的是增加加工品和服務（旅遊，娛樂，電信等）的大眾消費，它既不是社會性的，也不是環境可持續發展的。 這種模式主要

有利於大型農業企業和私人銀行，另外，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民主思想轉向大眾消費，有助於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精英攫取權力。

- 面對當前的食品危機和環境危機，必須迅速做出徹底改變。 下面列出的建議，是基於糧食主權的農業和商業政策，其思路是切實可行的。 他們將穩定糧食價格，維持在能夠保證絕大多數國家的可持續糧食生產的水準。

在地方層面

- 支援地區的農業生產，特別是支持農業實踐並促進小生產者獲得信貸，無論他們是男性還是女性；
- 支持和發展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短捷或直接的銷售管道，確保價格既讓農民有錢賺，又讓消費者買得起；
- 鼓勵本地產品的消費；
- 支持更多自主形式的，比使用化肥的生產形式更少受價格波動影響的生產（例如，在草地放牧，而不是用玉米/豆類餵養畜牧）。

由威科i·布日奧爾特·馬努斯（Vicki Briault Manus），亞當·克拉克-基明（Adam Clark-Gimmig）和麥克·科洛裡科夫斯基（Mike Krolikowski）（CADTM）翻譯。

註腳

[1] http://www.commoditybusinessawards....

[2]嘉能可-斯特拉塔是一家原材料貿易和經紀公司，由交易員馬克·裡奇創辦。 他們的總部設在瑞士楚格州的巴爾市，該地被稱為避稅天堂，受逃稅者青睞。 馬克·里奇在2013年去世，曾多次被控貪污和逃稅。比爾·克林頓在其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特赦了他，這成了不小的醜聞。嘉能可-斯特拉塔公司部分或全盤的擁有150處礦山和冶煉場。 根據現有資料，嘉能可在2013年與Xstrata合併之前，控制了全球約60%的鋅庫存， 50%的銅庫存， 30%的鋁庫存， 25%的煤庫存， 10%的穀物庫存和 3%的油庫存。2008年這個飽受爭議的公司因為是最不負責任的跨國公司而贏得了‘眾目睽睽獎’（Public Eye Award）。 目前在50個國家，嘉能可-斯特拉塔有19萬名員工（參見：[http://www.glencorexstrata.com /ass...）。 它的主要股東是伊萬·伽爾森伯格（Ivan Galsenberg），擁有16%的股份，據說，2013年他已獲得約6千萬美元，（參見：http://lexpansion.lexpress.fr/econo ...）。瑞信（Crédit Suisse）和嘉能可-斯特拉塔是中國市場上的密切合作者。其他專門從事大宗商品交易的大公司（除銀行之外的非常積極的公司）有維多（Vitol，荷蘭），嘉吉（Cargill，美國），托克（Trafigura，荷蘭），來寶集團（Noble Group，Hong-Kong/Singapore），豐益國際（Wilmar，新加坡），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法國），三井（Mitsui，日本），三菱（Mitsubishi，日本），ADM（美國）。2012年，嘉能可和上述9家公司的合併收益為 12000億美元的天文數字。見金融時報，«交易巨頭的艱難時期»，2013年4月15日。

[3] 參見專門的網站：http://cib.bnpparibas.com/Products- ...

[4]金融時報，«法國巴黎銀行銷售商品貸款»，2013年8月23日。

[5] 在銀行危機的最糟糕時刻，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得到了全方位的銀行牌照，充分利用政府援助，避免了遭受雷曼兄弟的相同命運。

[6] 回音，“美國銀行被指控操縱原材料（Des banques américaines accusées de manipuler les

matières premières）”，2013年7月24日，http://www.lecho.be/actualite/entre ...

[7]金融時報，“摩根大通接近商品銷售”，2014年2月6日，巴克萊銀行已經為這件事情付出了4.7億美元的罰款。

[8] 緊接著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在2014年初宣佈，他們打算賣掉自己的實際商品活動。摩根士丹利與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訂立協議，移交其一部分業務。

[9]在這些市場的主角有礦業和勘探公司，力拓（Rio Tinto），必和必拓（BHP Billiton），淡水河谷（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Mobil)，英國石油公司(BP)，殼牌石油公司(Shell)，雪佛龍公司(Chevron)，道達爾石油公司（Total），在食品市場上有前面所提到的，嘉吉(Cargill)以及雀巢(Nestles)，孟山都（Monsanto）和其他許多公司，包括中國的投機者。

[10] 見同一作者2007-2008年的文章，“尋求糧食危機的根源。”2008年11月21日出版，http://cadtm.org/Getting-to-the-roo... ；另見：達明·米勒和埃裡克·杜桑，“為什麼在21世紀饑荒會橫行以及如何才能根除它？” 2009年4月24日出版， http://cadtm.org/Why-is-there-rampa ...

[11]高盛，摩根士丹利和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直到他們解散或被接管。

[12] 除了少數例外，主權財富基金是公共機構，要麼屬於像中國那樣的新興國家，要麼屬於石油出口國。第一個主權財富基金創建於20世紀下半葉，由那些想把其部分收入脫離石油和加工品的政府所創建。從全球來看，在2008年初，機構投資者代表70 000個USD，主權財富基金30000億和對沖基金 10000億。

[13]會員管理/投資組合經理，馬斯特資本管理有限責任公司，麥可・W・馬斯特在國土安全委員會和政府事務美國參議院的證詞，[http://hsgac.senate.gov/public/_fil ...]

[14]見美國馬里蘭大法學院教授邁克爾·格林伯格在美國參議院委員會的證詞，關於“能源市場操縱和聯邦執法制度”，2008年6月3日，第22頁。

[15] 見J.活脫，«透視世界糧食價格上漲»（Démêler le vrai du faux dans la flambée des prix agricoles mondiaux）2008年7月15日，第51至56頁。 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 ...（僅法文）。

[16] http://www.lalibre.be/index.php?vie...

[17] 保羅・約利奧，«財務的自殺(Le suicide de la finance）»，世界報，2012年10月9日（僅法文）。

[18] 讓·齊格勒，“饑餓是人為的，人也能去除它”，對埃裡克·杜桑的採訪， 2012年2月11日出版， http://cadtm.org/Hunger-is-man-made ... 讓·齊格勒是‘大規模的破壞，饑餓的地緣政治’一書的作者，Seuil版本，巴黎，2012年

[19]參見（法語）世界報，“四家法國銀行被指控‘投機饑荒’”（ Quatre banques françaises accusées de "spéculer sur la faim"），2013年2月11日。 http://www.lemonde.fr/economie/arti... 。關於樂施會的國際運動，見‘金融時報’，“對於食品價格的投機活動下架”，2013年3月4日，另見樂施會網站“關於抑制投機食物的歐盟協議來得及時”， 2014年1月15日， http://www.oxfam.org/en/eu/pressroo ...

[20] 參見（法語） http://blogs.lecho.be/argentcontent ...

[21]題為“替代方案”的部分來自“‘農民之路’建議設置關於農產品價格上漲和投機的平臺（Proposition de document de position de la Via Campesina sur les prix agricoles et la speculation）”， 2008年7月。

關於俄國革命的三種觀念(特譯)

托洛茨基著(1939年8月) 史丹譯

1905年革命不僅成為“為1917年而作的總彩排”，並且也成為一個實驗室，讓俄國政治思想的各種基本的組分浮現，也讓俄國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各種傾向和型態成形，或具備了基本的輪廓。而在芸芸爭議和分歧中間，有關於俄國革命的歷史屬性及革命在未來的發展道路這兩個問題，自自然然的佔據著中心位置。 就在這場有關觀念和預測的戰爭裡，又或是這場戰爭本身，它和斯大林的傳記並無直接的關係---斯大林其人在其間並沒有個別獨立的發生一部分的作用。 他就這個問題所寫的寥寥幾篇的宣傳文章，在理論方面沒有絲毫的興味。 有好一大批能寫一手文章的布爾什維克，為同一個見解寫過好一批推廣文章，並且寫得更為有力。按事情的本質而論，對布爾什維主義帶批判性的論述，理應在列寧的傳記中記載才是。

然而，理論自有其本身的命運。 從第一次革命至1923年當革命理論得以推廣和實現的時期，斯大林在其中既無獨立的位置，則到了1924年及往後，局面卻是大為改觀。 從那個時候開始，開啟了過去官僚反動及對過去作出相反的評價的時代。 革命的影片倒轉來放映了。 舊有的學說被經常重新評價，或被作出新的詮釋。“不斷革命論”的觀念被作為“托洛茨基主義”各種重大而無知過失的源頭，成為了關注的焦點，這在驟眼看來是頗令人感到意外的。繼此之後的若干年裡，對於“不斷革命論”的批判便構成了斯大林和他的合作者的理論性--- sit venio verbo [假如能用上這個詞的話] 著作的主要內容。 可以說，在理論的平面上，斯大林主義的全部，就是從批評不斷革命論在1905年制訂的公式中生長出來的。 事既至此，那麼便不能不把與這個孟什維克派和布爾什維克派的理論有所區別的理論收在這本書裡陳列，哪怕是用附錄的形式也好。

俄國發展的特性首先是由它的落後性顯示出來。可是這歷史的落後性並非顯現為僅僅是對先進國家的發展遲緩了一或兩個世紀的簡單的複製，而卻是造成了一個全然嶄新的“配合的”社會構成。 在這個嶄新的“配合的”社會構成裡，資本主義技術和資本主義結構最晚近的戰利品置身於封建和前封建的野蠻主義的關係內紮根，把它們改造，令它們臣服，並蒂造一個使各個階級互為交錯的特有關係。 同樣的事情也應用到思想的領域。俄國正是由於其歷史遲緩性，結果是成為了唯一的歐洲國家，馬克思主義之學說及社會民主黨能夠走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得到強勁的發展。 有關民主鬥爭和社會主義鬥爭的互為關係的問題，正是在俄國被給予了至為巨細無遺的理論分析，是理所當然不過的。

唯心的民主人士，主要的是那些民粹派，迷信地拒絕承認來臨中的革命是個資產階級革命。 他們用一個中立的政治公式加上“民主的”探尋標籤來掩飾其社會內容 --- 不僅用來蒙蔽他人，而且也藉以蒙蔽自己。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普列漢諾夫在反對民粹派的鬥爭中，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已經確定，俄國絕無理由期望享有一條特權的發展道路，她將會一如

其他“世俗”國家，務須經過資本主義煉獄的洗禮，而且正是沿著這條道路，她才會得到無產階級在爭取社會主義而進一步作鬥爭中必不可少的政治自由。普列漢諾夫不僅把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從社會主義革命分離出來 --- 他把後者推延至遙遠的未來 ---他並且為每一場革命描繪出迥然不同的力量組合。無產階級得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組成同盟以達到政治自由；在經過幾十年資本主義發展及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更高水準上，無產階級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直接進行鬥爭。

列寧就此在1904年寫道：

“俄國的知識份子往往認為，承認我們的革命是個資產階級革命，就是使這個革命失去光彩，令它降級，令它貶值….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在資產階級社會內為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國而鬥爭，只不過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一個必要階段而已。”

“馬克思主義者絕對相信，” 他在1905年寫道：“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 這表示了什麼？這表示到那些對俄國成為必不可少的…那些民主演變的本身和關於這些民主的演變，並非意味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統治受到逐漸的侵害，而卻是相反，那些民主演變是首次而且真正地為一個廣闊和迅速的，歐洲式的而不是亞細亞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清理土壤。他們將首次令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統治成為可能…

“我們不能跨越俄國革命中的資產階級民主架構，” 他堅持，“但我們能夠把這個架構極大地擴充”。

也就是說，我們能夠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為無產階級的未來的鬥爭締造大為有利的條件。列寧是在這些限度之內追隨普列漢諾夫。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兩個派別的出發點。

在這樣的條件下，科巴（斯大林）在他的宣傳裡沒有超出構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派的共同財產的那些普及公式，是相當理所當然的，。

“立憲會議”，他在1905年1月寫道，“是在平等，直接和不記名的全民投票下選出---我們現在必須為它而戰鬥！ 唯有立憲會議才會給予我們一個民主共和國，這是我們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所緊迫需要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是為了爭取社會主義這個目標而進行的漫長的階級鬥爭所在的場所----是這麼的一個前景。

在1907年，也就是說，在經過了彼得堡和國外報章的無數討論之後，及經過了第一次革命對理論性的推斷作出嚴峻的測試和經驗之後，斯大林寫道：

“就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它必須毀壞封建的秩序而非資本主義的秩序，革命只能是給民主共和國冠冕這點 --- 看來全都為我們的黨所同意。”

斯大林並非是說關於革命是由什麼來開始，而卻是在說它以什麼來結束；他並且先行作出限制，相當確定它“只能是民主共和國”。我們在他的著述裡尋找與民主顛覆相關聯起來的

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即使是那麼一點點的提示，也將是徒勞枉然。他一直保持著這個立場，以至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伊始列寧抵達彼得堡其時，他仍然是這個立場。

對普列漢諾夫，阿克塞爾羅德和孟什維克主義的領袖們總體來說，革命在社會學上的特徵是資產階級這點，之所以在政治上富有價值的，首先是由於它在事先就禁止了社會主義的幽靈向資產階級尋釁，以至於把資產階級“驅往”反動陣營去。“俄國的社會關係只是對資產階級革命才是成熟的，” 孟什維克主義的頭號戰略家阿克塞爾羅德在統一大會[1906年4月]上說道，“在我國面臨著普遍被剝奪政治權利，當前，就是使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之間為爭奪政治權力而進行直接對拼也是不該的…無產階級是為了爭取資產階級發展的條件而鬥爭。客觀的歷史條件下為我們的無產階級所造就的命運，就是在反對共同敵人的鬥爭中，與資產階級進行無可逃避的合作。” 俄國革命的內容，從而在事前便被限定在切合于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利益和見解的那些演變之內。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派的基本分歧，正是在這一點上開始。布爾什維主義拒不同意俄國的資產階級能夠把它本身的革命帶領到底。列寧較普列漢諾夫遠為有力和貫徹的把農民問題推進為俄國的民主翻身的中心問題。“俄國革命的癥結，”他重申，“是農民（土地）的問題。對革命的成功或失敗結論，必須根據…. 群眾為爭取土地而鬥爭的條件所作出的估量。” 列寧同普列漢諾夫一樣，把農民看作為小資產者的階級，把農民的土地綱領看為是資產階級進展的綱領。“國有化是資產階級的措施，” 列寧在統一代表大會上堅持說，“它將給予資本主義發展推動力，它將令階級鬥爭尖銳化，助長土地的動員，引起資本流進農業，減低穀物的價格。” 然而，儘管農民革命有著無可置疑的資產階級性質，俄國的資產階級對於剝奪地主階級的莊園仍是滿懷敵意，正是由於這個理由而在一個仿照普魯士模式的憲法的基礎上向君主制努力努力謀求妥協。列寧對應於普列漢諾夫所提出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組成同盟的見解，提出了無產階級與農民組成同盟的反建議。列寧宣稱，這兩個階級的革命合作的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 “民主專政”，以此作為激烈地清潔俄國的封建廢物，創立一個自由農民的制度，以及為了沿著美國而非普魯士的路線發展資本主義而清除道路的唯一手段。

他寫道，革命勝利的加冕，“只能是專權，因為無產階級和農民即時地和急迫地需要完成的演變，將會激起地主，大資本家和沙皇的奮力抵抗。沒有專政，便無法粉碎這種抵抗，無法打退反革命的企圖。但這當然不會是社會主義的專政，而卻是民主的專政。它不能夠觸及（在沒有革命性發展的一連串的過渡階段之下）資本主義的基礎。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將能夠實現有利於農民的土地財產的激烈的再分化，引入貫徹全盤的民主主義，進而至設立共和國；不僅把農村，甚至把工廠日常生活中的亞細亞式和封建的特點連根拔起，開啟工人條件的重大改善，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最後，但並不是最次要的，把革命的火焰推廣至全歐洲。”

列寧的觀念，就它不是從憲政改革出發，而是把農民傾覆作為革命的中心任務，並且指

出了完成這個任務的唯一現實的社會力量組合，就這兩個方面來說，代表了異常巨大的前進一步。不過，列寧這觀念的脆弱之處，是“工農民主專政”思想的內在矛盾。列寧公開地把這個“專政”稱為資產階級的其時，他本人就著重指出了這個“專政”的基本限制。對此，他想說的是，無產階級為了與農民保持同盟，它在來臨中的革命就要犧牲直接地提出社會主義的任務。 但這樣一來，就意味著無產階級要放棄自身的專政。 由此而來的結果，問題的要點就是農民的專政，即使這個專政是有著工人的參與。

在某些場合裡，列寧談到的就到此為止。例如，在斯德哥爾摩[1906年4月]會議上，列寧駁斥普列漢諾夫挺身出來反對奪權的“空想”的時候說道：“目前正在討論的是什麼樣的綱領？農民的綱領。在此綱領下假設是由誰來奪取政權？ 革命的農民。列寧是把無產階級的政權和農民的混為一談嗎？” 列寧引述他自己的見解來說不。他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政權與農民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政權截然區分開來。他凜然再問：“可是啊，沒有經由革命的農民來奪取政權，怎麼可能是一次成功的農民革命？” 列寧在這個論戰的公式裡特別清晰地暴露了他的立場的脆弱性。

在這個以城市為其匯合點的幅員廣大的國家上，農民四處分散，星羅棋佈。 農民利益的差異性就如它所處的各個區域的差異性一樣大，令它本身也無法為自己的利益制定一套公式。各省之間的經濟聯繫是由市場和鐵路創建，但是市場和鐵路兩者皆由城市掌握。 農民在尋求脫離村莊的限制，推廣自身的利益之時，不可避免地陷入對城市的政治依賴。 最後，農民以其社會關係來說也是混雜不純的：富農自然地偏向往城市資產階級方面尋求同盟，而農村的下層則被拉向城市工人的一面。 農民在這些條件下，是完全沒有能力把政權征服的。

在古代中國，革命誠然是把農民推上政權，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把農民起義的軍事領袖推上政權。 這每次都導致土地的重新劃分，建立新的“農民”朝代，歷史從而又從頭開始； 有土地新的集中化，新的貴族，新的高利貸制度，新的起義。革命每次保留著純粹的農民屬性，社會便無法擺脫這些絕望的惡性循環。 這就是古代亞洲歷史的基礎，其中也包括了古代俄國歷史。 在歐洲，中世紀結束以來，每次勝利的農民起義皆不是把一個農民政府推上政權，而是把城市的左派政黨推上政權。更為準確的說，一次農民起義勝利的程度，是和這次起義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鞏固城鎮人口的革命部分的地位完全相當的。 在二十世紀的資產階級俄國，根本就談不上革命農民的奪權。

對待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態度，一如所說，是區別社會民主人士之間的革命家和機會主義者的試金石。 俄國革命能走多遠？ 這未來的臨時革命政府會是什麼性質？它將面臨什麼任務？ 向它挑戰的又將是什麼秩序？ 只有以無產階級政策的基本特徵為依據的基礎上，才能正確地提出所有那些重要的問題，至於那個政策的性質反過來又會首先由對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態度所決定。 普列漢諾夫明明白白的，固執地閉上眼睛，對待19世紀的政治史所得的基本結論是：每當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站出來，資產階級便轉而投向反革命的陣營。

群眾鬥爭愈是大無畏，自由主義的反動墮落便愈要迅速。迄今為止，仍未有人發明出一種手段，以能化解階級鬥爭的規律所發揮的效應。

“我們必須珍惜來自非無產階級政黨的支持，”普列漢諾夫在第一次革命的年月間一再重複道，“不要被我們‘不得體’的行動令他們反感。” 這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就用這種單調乏味的訓誨來顯示出，社會活生生的動力是他所不能企及的。‘不得體的行動’是能夠使個別敏感的知識份子反感；階級和黨派則是由社會利益吸引或排斥。列寧回答普列漢諾夫說：“可以肯定的說，自由派和地主會原諒你成千上萬次‘不得體的行動’，但卻不會原諒你號召來一次奪取土地。”而且不僅是地主而已。資產階級的上層是經由財產利益的聯合，並且更狹義的是經由銀行的制度而和土地主綁在一起。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和知識階層在物質上和道德上依賴於大型和中型的財產所有人---所以這些人都害怕獨立的群眾運動。同時，為了推翻沙皇制度，便有必要喚起成千上萬的被壓迫者，英勇而自我犧牲的投進一場義無反顧地進行到底的革命衝鋒陷陣。唯有在打著他們自身利益的旗幟下，從而令他們以地主為首的各個剝削階級懷著無可妥協的敵對精神，廣大的群眾才會奮而起義。因此，是革命本身的內在規律令資產階級“反感”而遠離革命的工人和農民；不論任何外交手段和‘得體’的手段，皆無法回避革命的規律。

列寧主義對自由主義的評價，月複一月地得以證實。立憲黨人不僅與孟什維克的良好願望背道而馳，並無準備登上屬於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首領位置，而且更相反的，越來越多地發現他們的歷史使命是反對這場革命。

籍助於那個短命的國家杜馬而得以佔據政治前臺的自由派，，在繼粉碎了十二月起義之後，用盡一切努力，尋求向君主制自圓其說，並且為他們在1905年的秋天當“文化”最為神聖的道具倍受危險的威脅時，他們當時的力不從心的積極的反革命行動尋求開脫。與冬宮進行幕後談判的自由派領袖米留可夫在報刊上相當正確地證明，立憲黨人在1905年年底時甚至不能在群眾眼前現身。他寫道：“由於我們當時沒有組織會議以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革命妄想來表示抗議，現在為此在責備我們的那些人…乾脆就不明白，又或是忘記了當時那些民主的公共集會的情緒是怎樣的了。” 自由派領袖們心知肚明，這個“托洛茨基主義的妄想”，就是把城市，士兵，農民和所有壓迫者最低下的層份的同情吸引到蘇維埃來，並因而引起“有教養的社會”的反感的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孟什維克的演變沿著與此平行的路線展開。他們由於在1905年10月之後與托洛茨基一度出現在一個聯盟之內，為此而必須越來越頻繁地向自由派自圓其說。孟什維克的才華洋溢的宣傳家瑪律托夫甚至做出這樣的解釋，他們有必要向群眾的“革命妄想”作出讓步。

在第比利斯，各種政治團體按照與彼得堡相同的原則形成。高加索的孟什維克領袖若爾達亞寫道：“粉碎反動，成功征服和把憲法推行到底 --- 這就有賴於有無產階級的力量和資產階級的力量這兩方面有意識地聯合起來，共同為一個單一的目標奮鬥…，農民也將被拉到運動中去，給運動注以基本的屬性，但只有那兩個階級才會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而農民運動

則會讓它更加有利可圖。”若爾達亞懼怕對資產階級施行不妥協的政策將使工人註定無能，列寧對此予以嘲笑。他寫道， 若爾達亞“論及無產階級在一次民主顛覆中的可能孤立，他並且忘記了…農民！他知道無產階級的所有可能的盟友，癡心傾慕于自由派---地主。 而他卻不知道農民。 這尚且發生在高加索！”

列寧的反駁在本質上是正確的，但他在一個點上把問題簡化了。 若爾達亞並沒有把農民“忘記”，而且可以從列寧的暗示裡得知，若爾達亞是不可能在高加索地區把農民忘記的，因為農民當時正是在孟什維克的旗幟下驟然冒起的。 只不過，若爾達亞並不那麼把農民看為是政治盟友；他毋寧是把農民看作為可以而且應該被與無產階級聯成一線的資產階級所動用的歷史槌城棒。 他不相信農民在革命中具有成為一支領導力量甚至是獨立力量的能力，而在這一點上他並不錯； 但他也並不認為無產階級有能力領導農民起義直至勝利 --- 就是在這一點上，他犯了致命的錯誤。

孟什維克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結盟的見解，實際上意味著把工人和農民兩者都從屬到自由派之下。 這個綱領的反動的空想主義，是由這個事實所決定的:即遠為先進的階級分解，已在事先令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素瓦解無力。 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布林什維主義是完全對的：追求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結盟，將不可避免地把社會民主主義提出以和工農的革命運動對立。 孟什維克在1905年的時候仍然缺乏勇氣，為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得出所有必要的結論。 到1917年，他們把見解推向其邏輯性的結論，從而焦頭爛額。

就對待自由派的態度這個問題上，斯大林在第一次革命的年月中是站在列寧的一邊。 必須指出，在此期間，就關乎作為對立面的資產階級這個課題上，大部分的孟什維克基層比較接近列寧而非普列漢諾夫。 知識份子激進主義的文藝傳統對自由派素來抱持輕蔑的態度。 但在這個問題上，即對高加索的社會關係的分析方面的新論點，甚至是對舊有的論據作新的系統性的闡析， 人們若要找出科巴（斯大林）的獨立貢獻，將會是徒勞無功。普列漢諾夫之對於高加索的孟什維克領袖若爾達亞，列寧之對於斯大林，相較而言，若爾達亞是比斯大林遠為獨立得多。 “自由派的先生們徒然地設法，”科巴在1月9日之後寫道： “挽救沙皇搖搖欲墜的寶座。 他們徒勞地向沙皇伸出援助之手！…”

“興起的平民大眾已經為革命作好準備，絕不與沙皇調解…是的，先生們，你們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了。 俄國革命不可避免，就像太陽必然升起那樣不可避免！ 你能夠制止初升的太陽嗎？ 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諸如此類。 科巴無法比這升得更高。 兩年半後，他幾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複列寧的話，他寫道：“俄國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是反革命的。 它無法作為策動力，而且更無法作為革命的領袖。 它是革命的死敵；必須向它發動頑強的鬥爭。” 可是，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斯大林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經歷了徹底的蛻變，他就是一個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結成集團的黨徒，並順利成章地作為一個擁護與孟什維克統一在一個政黨之內的啦啦隊員來迎接二月革命。 只有當列寧從國外歸來，才截然斷然的結束了斯大林的獨立政策，他稱之為

冒牌的馬克思主義。

民粹派只是視工人和農民為“勞苦者”和“受剝削者”，他們一律對社會主義感到興趣。馬克思主義者把農民視為小資產階級，而只當農民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停止作為農民，他才能夠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民粹派以其特有的感傷主義，把這項社會學的界定理解成為對農民的道德譴謗。俄國的各種革命傾向沿著這條路線進行了歷時兩代的重要鬥爭。要理解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後來的紛爭，就有必要再一次強調，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整個傳統，列寧從來不曾有過片刻把農民視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盟友。與此相反，列寧正是從農民的龐大優勢推論出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可能性。這個見解貫穿了他所有的直接或間接地涉及農民問題的全部文章。

列寧在1905年9月寫道：“只當農民運動是一個革命的民主運動，我們才支持農民運動。我們作了準備（就在當下，即時地），當它作為一個反無產階級的反動運動出現時，與它進行鬥爭。馬克思主義的全部要點就在於這個雙重任務。” 列寧在西方無產階級裡，和部分地在俄國農村的半無產階級分子中看到了社會主義盟友，但他從來不曾如此看待農民。“我們不惜所有措施，從始到終，直至沒收土地，” 列寧以其特有的執拗重申，“全盤地支持農民反對地主，而在稍後（甚至不是稍後，而是與此同時）我們全盤地支持無產階級反對農民。”

“農民將會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勝出，”他在1906年3月寫道，“並因此而將徹底耗盡它在為農民的革命精神。無產階級將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勝出，並因此才能實實在在的展開社會主義真正的革命精神。” “農民的運動，” 他在同年五月再次申述，“是不同的階級的一個運動。這個鬥爭並不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根基，而是掃蕩所有封建的殘餘。” 這種見解可以在列寧的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中，年復一年的繁浩文卷中找到。其中的語言和例子或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相同的。而且不可能是其他。要是列寧把農民視作社會主義的盟友，他不會有絲毫的理由，那他堅持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把“工農專政”限定在純粹的民主任務之內，就會是毫無根據的了。在這些情況下，列寧在指責本文作者“低估”農民的時候，他腦子裡想的完全不是我不承認農民具有社會主義傾向，但是相反，列寧的見解是認為，我並未充分承認農民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的獨立性，它的創建本身的政權的能力，及因而具有妨礙無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專政的能力。

對於這個問題的價值的重新評估，是到了特爾米多反動的年月裡才展開的，而這個開始又與列寧的病重和死亡大約同時發生。從那個時候開始，俄國工人和農民的結盟及這個同盟本身，便被宣佈為反對復辟威脅的充分保證，以及在蘇聯國境內實現社會主義的不可變易的盟誓。斯大林用一國社會主義論來取代世界革命論，他開始設定不同於“托洛茨基主義” 的馬克思主義對農民的評價，更有甚者，這個評價不僅涉及當前，並且涵蓋整個過去。

人們誠然是可能提出這個問題的，即馬克思主義就農民問題的經典見解，是否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呢。關於這個題目，將會超出這篇評論的範圍。這裡只表明一點就夠了：馬克思

主義從來沒有把農民看為一個絕對而固定不變的非社會主義的階級。 馬克思本人就說過，農民不僅擁有迷信，況且也有說理的能力。 農民本身的性情隨著變化的條件而變化。 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體，給予對農民影響和再教育農民開啟了非常廣大的可能性。 歷史迄今為止仍未竭盡這些可能性的限度。

然而，時至今天已經很清楚了，在蘇聯，國家的高壓統治日益增加的作用，並沒有駁斥而卻是印證了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從民粹派區別開來的對待農民的基本態度。 不過，在新政權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無論新政權現時的局面如何， 迄今仍然不容置疑的，就是截至十月革命為止，或更正確地說，直到1924年，在馬克思主義陣營裡，沒有一人--- 更不會是列寧了 --- 把農民視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因素。列寧反復重申，如果沒有西方無產階級的革命，俄國復辟是不可避免的。 列寧沒有看錯：斯大林官僚不是別的，而是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一階段。

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兩個基本派別的分歧點。 不過就在第一次革命漸露端倪的時候，還有第三立場，與上述兩個派別並行不悖。這第三個立場在那些年月裡沒有多少人認同，但有鑒於它在1917年的事件中得到印證，更由於在十月革命的七年後，這個觀念在備受到顛倒混淆之後，在斯大林和整個蘇聯官僚政體中開始發揮了之前完全不曾預見的作用，所以我們不得不有必要在此作出全面的說明。

1905年初，托洛茨基的一本小冊子在 日內瓦發表。 這本小冊子分析了在1904年冬天展開的政治局勢。 作者得出的結論是，自由派獨自進行的請願運動和宴會，已經窮盡了所有的可能性； 而寄希望于自由派的激進知識階層也與之一起 ， 走入死胡同； 農民運動正在開創出有利的條件，但卻沒有將之把握的能力；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武裝起義才有可能達至定案；而朝著這條道路走向的下一個階段，將是總罷工。 這本小冊子因為寫在彼得堡血腥星期日之前，所以題目是“一月九日之前”。 繼那天之後發生的澎湃有力的罷工浪潮，以及給罷工浪潮推波助瀾的最初的武裝衝突，是對這本小冊子所作的戰略論斷毫不含糊的確證。

給我這本小冊子寫引言的是俄國僑民帕武斯，他在其時已經成功地成為著名的德國作家。帕武斯其人獨具富創造性的個性，他能夠受到他人見解的影響，也能夠用他自己的思想豐富別人。 以他作為思想家和作家的才華， 他缺乏內心的均衡和缺乏對工作的熱愛，以對勞工運動作出有價值的貢獻。 他對我個人的發展，特別是關於我們時代的社會革命的理解方面，發揮了不容置疑的影響。 在我們第一次會晤之前幾年，帕武斯滿懷熱情的捍衛在德國舉行總罷工的想法。 不過，德國當時正經歷一次冗長的工業擴張期，社會民主黨亦已經投霍亨索倫王朝政權的所好， 一個外國人的革命宣傳除了招來尖酸的冷待外，別無其它。 在彼得堡流血事件後的翌日，帕武斯在熱讀我這本小冊子的手稿之後，他被無產階級在落後的俄國命定要發揮特殊作用這個見解所俘獲。

我們在慕尼克的那幾天裡，盡是娓娓不斷的交談，這些談話讓我們雙方得到許多澄清，

由此而令我們更加接近。帕武斯當時為這本小冊子寫的引言，堅實地載入了俄國革命的歷史中去。他在寥寥數頁裡闡明了遲緩的俄國的種種社會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在此之前不錯已經是為人所知，但是仍未有人作出必要的結論。

帕武斯寫道：眾所周知，西歐政治上的激進主義，主要是以小資產者為根據。這些小資產者是手工業工人，一般來說，是那些被捲進了工業革命但卻又被資產階級推到一旁去的那部分資產者…在俄國的前工業時期，城市發展較多地沿著中國而非歐洲的路線發展。城市都是行政中心，在性質上純粹是功能性的，沒有絲毫的政治重要性，而在經濟關係方面，它們是周邊地主和農民這類人作為交易的中心和集貿市場。這一類城市在受到資本主義按自己的模式建立大城市，也就是工廠城市和全球貿易中心而發展起來的進程所打斷的時候，它們的發展仍然是十分的微不足道，…妨礙小資產階級民主的發展，也就是造成手工藝生產模式的薄弱發展的這同一個事物，對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則大為有利。無產階級立刻在各個工廠集中起來……。

農民將會更大規模地給拖入到運動中去。但他們只能夠令國家的無政府狀態加劇，並以這種方式把政府削弱；他們不能組成一個緊密無間的革命大軍。因此，隨著革命的發展，將有更為浩瀚的政治工作落到無產階級的身上。與此並行的是，無產階級的政治自覺性將會擴大，其政治能量會越來越大。

社會民主黨將面臨兩難境地：要麼是為臨時政府承擔起責任，要麼是站在工人運動的一邊。而不管社會民主黨怎麼自處，工人將把這個政府視為他們自己的政府…俄國的革命顛覆只能由工人來完成。俄國的革命臨時政府將是工人民主的政府。如果社會民主黨領導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那麼這個政府將是社會民主黨政府。

社會民主黨的臨時政府將無法完成俄國的社會主義的顛覆，但清除專制制度和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這個進程本身，將會為其政治工作提供豐富的土壤。

在1905年秋季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件期間，我再次和帕武斯聚首，這一次是在彼得堡。我們在兩個派別之外保持著組織上的獨立性，聯手編輯一份群眾性的工人報紙，Russkoye Slovo [“俄國的話”]，並且與孟什維克聯合編輯一份大型的政治報紙Nachalo [“開始”]。不斷革命論通常把“帕武斯和托洛茨基”的名字聯結在一起，這只是部分正確而已。帕武斯的革命全盛時期屬於上個世紀末，那時他率領著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的隊伍，這個所謂的“修正主義”，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作機會主義的歪曲。他嘗試把德國社會民主黨推向一條政策更為堅定的道路上，這番努力的失敗，損害了他的樂觀。對於西方走向社會主義的前景，帕武斯的反應也是日甚一日的保留。他當時認為，“社會民主黨的臨時政府將無法完成俄國社會主義的顛覆。”因此，他的論斷所指向的，並不是把民主革命演變成社會主義革命，而不過是在俄國建立一個澳洲式的工人民主的政體而已，澳洲那時在一個農民制度的基礎上，首次出現了一個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政體架構的勞工政府。

我對這個結論並不苟同。 澳洲的民主政體是從一個新大陸的處女地上有機地生長出來的，它立即就具有保守的性格，並且把一個年輕而又富有相當特權的無產階級收歸其下。 俄國的民主政體則相反，只有在經過一個大型的革命顛覆才會產生，而這當中的動力，不論在任何情況下，皆不會允許工人政府保留在資產階級民主的框架內。 我們在1905年革命後不久之後發生的分歧，到了戰爭爆發的初期，當作為懷疑論者的帕武斯徹底消滅了革命家帕武斯，從而站到德國帝國主義者的一邊之後，我和他便以徹底決裂而告終。 帕武斯後來成為德意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亞伯特的顧問和啟迪者。

我從“一月九日之前”這本小冊子開始，不止一次我回到不斷革命論去，將之加以發展和說明。 有鑒於這個理論在本文作者日後在理論方面的演變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有必要用直接摘引我在1905年至1906年寫的著作的方式在此向大家呈現。

一個現代城市，至少是具有經濟-政治重要意義的城市，其人口的核心，是由工資尖銳分化成不同等級的工資工人構成。 正是這個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基本上不為人知的階級，註定在我們的革命裡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在一個經濟較為落後的國家，無產階級有可能比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更先取得政權。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自動地顛覆依賴于一國的技術能力和資源的這個假設，乃源自極度簡化的“經濟”唯物論的偏見。 這種見解與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儘管美國的工業生產力比我們高出十倍，俄國無產階級對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它對世界政治未來要發生的影響，比美國無產階級的作用和重要性是無可比擬地高出更多。

據我們的見解，俄國革命將開創出各種條件，俾令權力將會（而隨革命的勝利，更將是必定）在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客有機會全面培養出他們有治理能力的天才之前，落到無產階級手中…俄國資產階級正在把所有革命位置拱手交給無產階級。 同樣地，它也將拱手交出對農民的革命領導權。 當權的無產階級在農民面前將會作為一個解放者階級而出現…建基在農民之上的無產階級將會施展其渾身解數以提高鄉村的文化水準，培養農民的政治覺悟…但農民本身也許會淹沒無產階級，取代無產階級的位置？ 這是不可能的。 歷史的所有經驗對這種 假設提出抗議。 歷史表明了農民完全沒有能力發揮獨立的政治作用…我們如何看待“工農民主專政”的觀念，.這從我們已經說過的話裡已是一清二楚了。 問題的要點不在於我們在原則上是否接納它，也不在於我們認為這種政治合作的形式是否“理想”或“不理想”。 我們認為，“工農民主專政”是無法實現的，至少在直接和即時的意義上是如此。

有主張認為，作者在此陳述的觀念“越過資產階級革命”，這種主張在後來不斷重複。昔日的事態已經展示了這種主張是多麼的錯誤。我在那個時候寫道：“為俄國的民主革新而進行的鬥爭， 是完全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它是由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展開的力量來進行，矛頭是直接和首先針對橫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道路上的封建農奴制障礙。”然而，問題的所在，是什麼力量和什麼方法能夠消除這些障礙？

我們可以藉著主張我們這個革命的客觀目標是資產階級性的，從而為革命的所有問題設置一個界限，由此而來的必然結果，是我們對以下這個事實閉眼不看：這場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代理人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並且將會被革命的整個過程推向權力…你可以用這個思想麻痺自己，即俄國在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的社會條件還未成熟 --- 因此你可以罔顧以下事實，即無產階級一旦掌權，將會被它所處的局勢的整個邏輯所驅使，必然要引進一套由國家來運作的經濟體…無產階級的代表，將作為一個統治力量而不是無能的人質而當政，正是這個舉動，將把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間的界線消滅，也就是說，把集體主義置於議事日程。無產階級沿著這個方向在到達哪一點上才被制止，這將視乎力量的關係，但卻完全不會是由無產階級政黨的初衷所決定。

現在提出這個問題，不會是為時太早：無產階級專政勢所必然，必定要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框架面前被粉碎嗎？ 它不可能在特定的世界-歷史的基礎上， 通過把這個有局限的框架打碎而為自己開啟勝利的前景嗎？ ……可以確定的表明一點：如果沒有來自歐洲無產階級國家的直接支持，俄國的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權力，不能把它的暫時統治轉化為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

不過，由此而絕不會引伸出悲觀的論斷：

“ 由俄國工人階級所領導的政治解放把這個領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把龐大的力量和資源轉移到自己的手中，並使它成為全世界清算資本主義的先行者，歷史已經為清除資本主義造就了所有必要的客觀先決條件。”

就國際社會民主黨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其革命任務這點，我在1906年寫道：

“歐洲的社會主義黨派 --- 其中首推最強大的德國社會黨 --- 已經制定了他們各自的保守主義。隨著一批多似一批的群眾集結到社會主義，隨著這些群眾的組織和紀律的增長，這種保守主義也隨之增加。由於這個緣故，社會民主黨作為體現無產階級的政治經驗的一個組織，在某一時刻，可能會成為工人和資產階級反動派之間所爆發的公開衝突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礙。……” 然而，我是以下述保證來為我的分析作總結：“東方革命將以革命的理想主義鼓舞著西方的無產階級，引發它們用‘俄語’向敵人說話的意欲……”

且讓我們作出總結。民粹主義尾隨斯拉夫派之後，從幻想有一條絕對屬於俄羅斯自己的獨特的發展道路出發，繼續前行，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共和國不屑一顧。 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集中於證明俄國和西方的歷史道路的基本共性。 由此而得出的綱領，把俄國的社會結構和她在革命的發展方面真實不虛的，全然沒有神秘性的獨特性之置諸不理。 孟什維克對待革命的態度，在剝去插話性的外殼和個別偏離之餘，還原如下：唯有在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領導之下，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才是可以想像的，政權必須移交給資產階級自由派。 然後，民主的政權才會准許俄國的無產階級趕上西方的老大哥，以無可比擬地巨大得多的空前成就，踏上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道路。

列寧的見解可簡要簡述如下：遲來的俄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把自身的革命帶領到底。通過“工農民主專政”作媒介，革命的徹底勝利將把國家的中世紀主義清除，賦予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以美國的步伐，強化城市和農村的無產階級，為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開闢廣闊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俄國革命的勝利，將為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提供強大的推動力，而這又反過來不僅會保護俄國，令它免受復辟的威脅，同時也允許俄國的無產階級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時期裡得以奪取政權。

不斷革命的見解可以用以下幾句話來歸納：除了通過以農民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形式之外，俄國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是不可想像的。 無產階級專政將不可避免地把民主任務置於議事日程，並且不僅這樣，它不可避免地把社會主義的任務置於議事日程，而這同時將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提供強悍的推動力。唯有西方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護衛俄國免于資產階級復辟，確保俄國可能把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底。

最後兩個觀念，它們之與自由派-孟什維克黨人的見解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方面的同一性，以及它們在對待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關乎“專政”的社會性質和任務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極端的分歧，在上述扼要的公式中得到同樣清晰的披露。 當前的莫斯科理論家們，就有關於在1905年的時候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一再用“時機未成熟”來加以反對，全然是空洞無物之詞。 從經驗主義的意義來說，工農民主專政的綱領證明是同等地“時機未成熟”的。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力量關係的對比是如此之不利，乃至就是對革命的勝利本身也是不可能的，更遑論無產階級專政了。 與此同時，所有的革命傾向抱著全面勝利的希望繼續前進--- 沒有這樣的希望便不可能有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由此而派生出對革命的總體前瞻和總體策略的分歧。孟什維主義的前瞻是打從骨子裡錯誤的：它給無產階級指出迥然不同的道路。 布爾什維主義的前瞻的並不完全：它正確地指出了鬥爭的大方向，但對其階段卻有不正確的刻畫。 布爾什維主義的前瞻的不完全性在1905年沒有曝露出來，僅僅是因為革命本身在其時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但到了1917年初，列寧在反對黨內老幹部的鬥爭中，不得不把這個前瞻更改。

政治的測斷不能裝成像天文學的測斷那樣精確。 只要政治測斷對發展的總路線作出正確的指示，幫助人們在事態的實際進程中調擇方向，便已足夠；而事態進程的基本路線是必然會擺向右邊或左邊的。 在這個意義上，要不承認不斷革命的概念已經完全通過了歷史的考驗是不可能的。 在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年月裡，沒有人否認這點； 與此相反，這一事實在一些官方出版物中得到承認。但是，就在死寂和僵化的蘇維埃社會的最高層裡，開啟了官僚對十月的反動，這場反動從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這一理論---這一理論比其他理論更徹底地反映了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而同時又清楚地暴露了這個革命的不完全性，它的限制和局部的屬性。由此 而通過反彈的方式，產生了斯大林主義的基本教條，即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理論的起源。

（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

Immediate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dissidents

Zhang Kai

In 2004, under public press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irstly added the term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respect to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to the Constitution. It was merely on paper. In reality, people were repressed whenever they attempted to defend human rights. It repeated what Mao Zedong did in the 1950s, during which many people were purged due to their critiques of government policy. Nowadays, both central and local bureaucracies are corrupt, which leads to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being wronged. The innocent people cannot have legal protection. Many lawyers and dissidents courageously stand up and fight for human rights. Unfortunately, they were illegally arrested, with the criminal charges of "creating troubles", "disrupting social order", "and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Many were sent to prison for several years and even more than a decade. For example, Liu Xiaobo, the founder of Chapter 08, was given a verdict of 11-year imprisonment. He is still in prison now.

A lot of dissidents and lawyers of human rights have suffered in the prison. For example, in Sichuan Province, several people defending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released yet, except Tan Zuoren who was previously sent to prison due to his investigation of jerry-built projects at Sichuan Earthquake on May Twelfth. Li Liqian, the leader defending human rights after Sichuan Earthquake, disclosed that officials misappropriated compensation for earthquake victims. He then was accused of "assembling a crowd to disrupt social order" with 3-year imprisonment. He is supposed to be released in 2015. Moreover, Chen Wei, who attended June-Fourth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organized signature campaign for Chapter 08, was accused of "subverting the state" with 14-year imprisonment. He will be released in 2020. Liu Xianbin, who formed China Democratic Party and criticized the jerry-built projects, was accused of "subverting the state" and others. His imprisonment term is 25 years and 6 months. He will be released in 2020. Xu Zhiyong, the founder of New Civil Movement, who demanded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 information of their properties, as well as Guo Feixiong, the famous human rights defender, were arrested in July and August 2013. Three supporting people who come from Xinyu City, Jiangxi Province, were sent to jail for 3 to 6.5 years. Pu Zhiqiang, lawyer of human rights, helped Tang Hui, woman who petitioned, and attended a seminar on June-Fourth, was arrested for "creating troubles" in May. His defense lawyer and friend were also under arrest. Xie Wenfei, Luo Xiangyang, Xiucaijianghu, Yang Chong, Zhang Wanhe, who ar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all accused of "creating troubles" and detained. There is no latest information. On 20 June, Tang Jinling, human rights defender from Guangzhou, was arrested for "subverting the state". Jiang Yanfang, Tang's wife, said that "the charge is like a bag which covers every crime".

Recently, in Beijing, Xu Youyu, Hao Jian, Pu Zhiqiang, Hu Shigeng and Liu Di had organized a seminar on June-Fourth in a private residential place, then they were all arrested for "creating troubles". This caugh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Eight famous scholars such as Andrew James Nathan (USA), Perry Link (USA), Jean-Phillippe Béja (France) and Michel Bonnin (France), wrote an open letter to Xi Jinping, the President of China, urging the authorities to correct a mistake, and to release the recently arrested people. The letter said that when China has become a world power, some citizens are illegally arrested. This not only damages China's world image, but also causes unease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addition, the letter is concerned about the secret arrest of Gao Yu, independent senior journalist who was accused of disclosing state secrets. The letter said,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was the basic rule of the separation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Why does a document of the party become a secret of the state?" (quoted from *Mingpo*, dated 16 May).

In recent years, the repress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on dissidents and lawyers reveals its anxiety about the 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Although a huge amount of money is spent on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conflicts between the governing and the governed escalate and erupt, such as the terrorist attacks by Xinjia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other places. The attackers attempted to resist ethnic repression and to fight for the autonomous right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rough violence. There are lots of outbreaks of large-scale demonstrations, such as refu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emical plants and furnaces, fighting for the improvement of workers' conditions, against the demolishment of housing, land expropriation and displacement by local residents, hawkers opposing the unreasonable oppression and arrest by urban management.

Not long ago, freedoms of speech, publication and press are restricted. An unreasonable order of "Seven Forbidden Topics" is issued. On 18 June,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issued a notice to prohibit any branch or department of any media institution from news reports, on crossing their own area or boundary. Moreover, any journalist or branch is not allowed to make their own critical reports without any permission of the working unit. This has aroused controversy on the internet. To forbid a journalist to make criticism means to forbid his or her innate responsibility.

The State Council issues White Paper which curtails the freedom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which always enjoys "high autonomy" and juridical independence. All these are new proofs of authoritative bureaucracy. No wonder there is hardly any mention now of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people at the centre" apparently promoted by former leaders like Hu Jintao and Wen Jiabao, the new leader instead merely proposes the China Dream. This shows the toughness of the new ruler who occupies ten important pos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law of physics and social movement tells us that where there is oppression, there is resistance; the more the oppression, the more resistance. It is an iron law. 25 June 2014

OCTOBER REVIEW VOL. 41 ISSUE 1 2014.7.7

Hong Kong

2 Blossoming everywhere .....Da Jin
3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June-fourth and its vindication.....Juan Di
5 The great impacts of the largest scale of July 1 Demonstration in 2014.....Zheng Yan
6 General public of Hong Kong opposes Hong Kong White Paper of the State Council.....Jun Xing
8 Respond to "Methods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n 2017 and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16"(reprint).....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
9 Legalization based on human nature: questions about man maternity leave (reprint)Lau Shan Ching

Taiwan

10 Good result of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in Taiwan.....Zhang Yan
11 Comments on the courtesy and legality of student movement (reprint).....Liao Yuhui
12 An achiev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o. 4 nuclear plant in Taiwan being stopped.....Juan Di

Macau

13 The victory of Macau's people against the lavish retirement package bill.....Wei Bo

China

14 Immediate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dissidents.....Zhang Kai
16 Incessant outcries of water problems.....Po Mi
18 Comments on Yue Yuan Strike.....Qing Yan
20 Grassroots Societies of Japan and China should join together to fight against militarism.....Qiu Yue

International

21 Bosnia-Tuzla: building solidarities.....Miroljub Radomirovi
23 Tunis- "Bitter victories, but real ones": conversation with Ahlem Behladj.....Peter Drucker
25 Permanent revolutions and counter-revolu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 our tasks.....Fourth International
33 Fatal blow on US economy and democracy by Oligarchical class (commentary).....Zhao Jing
35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transforming the governance of Applied Materials Company (commentary).....Zhao Jing
36 2011-2014: Egypt's Revolution at Three.....Noha Radwan
44 Banks speculate on raw materials and food.....Éric Toussaint

Theory

50 Three concepts of Russian revolution (special edition).....Leon Trotsky

Article in English

62 Immediate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dissidents.....Zhang Kai

十月評論

第41卷第1期（總第236期）

2014年7月7日出版

香港

2 遍地開花……大進

3 紀念六四25週年與平反六四……涓滴

5 七一大遊行人數創十年新高，餘波激盪……振言

6 港人普遍反對國務院的香港白皮書……軍行

8 回應《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轉載)……社會民主連線

9 人性立法 — 男士侍產假的一些問題(轉載)……劉山青

台灣

10 台灣太陽花學運開花結果……振言

11 談學運的守禮與守法(轉載)……廖玉蕙

12 台灣反核四電廠爭取到停建……涓滴

澳門

13 澳門人民反「離保」法案獲得勝利……微波

中國

14 立即無條件釋放法律界和異議人士！……張開

16 水患之聲不絕於耳……破謎

18 談談裕元罷工……青岩

20 中日民間應該聯手反對軍國主義……秋月

國際

21 波斯尼亞圖茲拉：構建團結……米洛居布·拉多米洛維奇

23 突尼斯:“勝利雖苦澀，但真實不虛”對話……楞·貝爾哈德、彼得·德魯克

25 21世紀初的不斷革命和反革命 - 我們的任務……第四國際

33 寡頭階級對美國經濟民主的致命襲擊(來論)……趙京

35 推動應用材料公司治理的成功戰例(來論)……趙京

36 2011-2014：埃及革命三年……諾哈·拉德萬

44 銀行投機原材料和食品……埃里克·杜桑

理論

50 關於俄國革命的三種觀念(特譯)……托洛茨基

英譯

62 Immediate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dissidents……Zhang Kai